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集定價大洋七角

# 教育研究

合訂本  
第九集

R  
S 2045  
200-23  
X

國立中  
山大學

教育學研究所印行

第三十三期

頁數

東京自由學園……………黃 溥(一)

意大利教育制度的哲學背景(一)……………陳子明(五)

中國教育應否仍重知識……………胡 毅(三一)

目前中學教育之使命……………唐現之(三九)

民衆生計教育……………馮 銳(五一)

中國民族的出路與中國教育的出路……………莊澤宣(五五)

第三十四期

本校女中試行新法教學經過……………崔載陽(一一)

重訂乘法表之芻議及實驗結果……………李國藩(四五)

兩年來的附校量……………趙邦鏞(五九)

意大利教育制度的哲學背景(二)……………陳子明(九五)

第三十五期

民衆教育館組織問題的研究……………黃 裳(一一)

最近十四年來美國教育研究的範圍與種類……………張文昌(五七)

德意志之新憲法與新教育……………廖覺揚(六七)

關於科學教育的討論……………陶知行  
莊澤宣(八一)

第三十六期

中學教務表冊研究專號……………張文昌(一至一四六)

# 教育研究

載傳  
附題

##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致囑

## 本 期 目 錄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號（第三十三期）

東京自由學園……………黃溥（一）

意大利教育制度的哲學背景（一）……………陳子明（五）

中國教育應否仍重知識……………胡毅（三一）

目前中學教育之使命……………唐現之（三九）

民衆生計教育……………馮銳（五一）

中國民族的出路與中國教育的出路……………莊澤宣（五五）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 關於本期

本刊于十七年二月創刊時，曾「告閱者」，「我們希望除附錄外篇文章含有研究的性質或是可供研究的材料，至少我們想不發空論，不說廢話，足踏實地的做工夫。」四年以來時虞隕越。這四年中我們雖時時感到中國教育的不適合，偶發杞憂之論，但仍極力避免說得太空。自東北事變發生以來，我們不得不對於中國民族的出路與中國教育的責任各問題，加以研究。同人曾有非正式的討論多次，雖各有所見，但均覺這些問題的相連與急迫。適中華教育界出中國教育出路專號，同人讀之，不自覺地都願將各人所見的寫出來求教于同志。因此本期中除兩篇係與上期的有連續性外大都討論到這些問題，還有一二篇在付印時未及完稿，或于下期與閱者相見。特誌本期或下期多「空論」文章理由于此，閱者讀之或不至全視為「空論」也。

## 第廿五期「讀法專號」目錄

|                    |     |
|--------------------|-----|
| 讀法概論.....          | 陳禮江 |
| 歐美讀法研究述要.....      | 徐錫齡 |
| 中文讀法研究經過.....      | 杜佐周 |
| 最近關於讀法心理的幾個研究..... | 艾偉  |
| 成人默讀朗讀各種材料之試驗..... | 胡毅  |
| 讀法教學法.....         | 曹芻  |
| 中大附小閱讀測驗報告.....    | 曹芻  |
| 介紹幾本關於讀法的書.....    | 李敏釗 |
| 讀法名詞的漢譯.....       | 胡毅  |
| 零售每冊二角             | 編輯部 |

## 第三十二期「日本教育研究專號」目錄

|                         |     |
|-------------------------|-----|
| 日本現代教育哲學的發生與派別及其趨勢..... | 姜琦  |
| 日本師範教育的特點.....          | 林礪儒 |
| 日本教育思潮的綜合批評.....        | 雷通羣 |
| 日本教育制度的哲學背景.....        | 徐錫齡 |
| 日本學制概要(附最近統計).....      | 莊澤宣 |
| 日本明治維新後教育大事年表.....      | 古樸  |
| 關於日本教育的論文索引.....        | 彭仁山 |
| 零售每冊壹角五分                |     |

# 東京自由學園

我國中等教育，近年以來，頗形發達，學校與學生人數，日見增加，國內各大學教育學系，多研究中等教育，

所發表關於中等教育各項問題之文字，亦復不少，然細察國內各中學，無論公立或私立，男校或女校，能一洗因襲之弊，徹底改造，以學生為中心，以生活為課程者，百不一視，本年夏，溥與長沙雅禮中學同事數人赴日遊歷，藉以考察日本教育，至東京，由友人介紹參觀日本著名之自由學園，溥等深覺該校對於中等教育改造與設施上，有特殊貢獻，茲特介紹其組織情形，以饗我國之研究中等教育者。

(畧歷)：自由學園，係一日本私立女子中學，設于東京市外目白鎮，創辦人兼校長為羽仁夫人，羽仁夫人係日本著名雜誌「婦人之友」之主筆，為日本婦女界各種運動之領袖，因憤日本女學受因襲之束縛，不能自由發展，乃於一九廿一年春，集資創辦自由學園，不領政府津貼，不受任何人捐助，完全自由辦理，開始是，生徒不滿三十人，

十年內，增至三百餘人，數在日本女界服務，成績斐然。



黃溥

(學制與課程)：凡參觀自由學園者，一入園門，即知為一種特殊之學校，其建築與設備，異常精緻，校內所有陳列與裝飾，皆呈美術化與創作精神，處處整潔，令人生羨，學校課程，分普通科，預科，及高等科三部，普通科五年，所授學科：為修身，國文，英文，理科，算學，史地，美術，音樂等，預科一年，專為平常女子中學畢業生欲入自由學園之高等科者而設，所授之學科，與普通科畧同，高等科兩年，內分師範科，英文科，及縫紉科三種，每日上課之時間，至多二次，每星期共十七次，每次八十分鐘，午前兩次，九時至十二時，其中休息廿分鐘，午後一次，一時半至二時五十分，學生不寄宿，祇在校寄宿。

自由學園之課程，雖與普通女學大同小異，然不及他校之繁雜，且各科注重實際之需要，教授法因之亦異，每

607372

日專注重一門學科，如星期四注重英文，則全校於是日專讀英文，並利用種種學校生活，以練習英語，各科無考試，期終祇有報告會，由各生向校長與教員報告各科之心得，並討論研究各科之方法，此外學生常作種種課外活動：如長途旅行。爬山，泅水，舉辦運動會，藝術展覽會，音樂會，戲劇會，生日會，洋囡囡會等，以發展學生之天才，與生活之樂趣。

(團體生活)自由學園之特點，不在其課程組織，而在其學生團體生活之訓練，全校學生共分八班，每班約三十餘人，各班又分六小團體，名之曰「家」，每家五六人不等，各家學生，互相幫助，實行友愛，每班六家，各家皆有特名：如規律家，實行家，友愛家，獨立家，健康家，勤學家，每逢四月與九月，各家改組，其目的在使全校學生彼此發生極親密之友誼，全校共四十八家，以自由學園為一小社會每日每班輪流推舉班長一人，每家學生推舉家長一人，負責指導全班或全家事務，此外全校每日公推計時員一人，搖鈴計時，又動作員一人，朝會時報告學校每日之動作。

(學生委員會)自由學園學生，多來自中等社會以上之家庭，然學校極注重學生操作與勞動，全校無工役，事無大小，概歸學生按日輪流担負，如烹飪，灑掃，澆花，及各種整理清潔之事項，皆由學生辦理，學校所有一切事務，有學生委員會主持，該會設委員三十人，任期二月，由全體學生投票選舉，選舉後，由全體委員互推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其餘委員分為六部：如校舍部，膳食部，財務部，音樂部，體育部，圖書部，各部設部長一人，負責主持，學校慣例，凡學生委員會之主席及各部部長，皆須高等科二年級學生充任，以便指導。

(生活表)自由學園遊廊各處，皆懸掛學生每日生活表，該表分三類，一，個人生活表，二，每家生活表，三，每班生活表，個人生活表，內列十一項，由學生每日填寫，如：何時安寢，何時起床，何時到校，何時離校，個人健康，自修時間，個人費用，遺留物件，所著衣服，住舍清潔，本日應作事項等。每家生活表，由各家家長統計個人生活表，列出每日各家生活狀況。每班生活表，由每班班長統計六家生活表，列出全班生活狀況，如是全校學生

生活狀況，一覽便知，學生如有不守常規者，由家長或班長或他同學勸告，學校無規律制裁，全校師生純以友愛誠實與合作精神相砥礪，每月終，凡學生未缺課且身體健全者，由同學於開會時，請至禮堂臺上受同學賀，如一年未缺課且身體健全者，由同學發給獎章，以資鼓勵。

(每日狀況)自由學園每日狀況如下：每晨六時三刻，有學生二人先到校將校門及各校舍啓開，七時半，計時員搖鈴，即有學生五十餘人，持帚打掃全校，同時各班長點名，并檢驗各班同學之身體，八時，全校學生加入晨操，由學生主領，數分鐘後，即齊赴禮堂，舉行朝會，由班長八人司儀，羽仁校長演講，詞多注重學生之靈性修養，與精神生活，演講後，由學生委員會副主席一人，報告本日到之學生人數，及學生健康之情形，再由計時員及動作員，報告本日全校之事項，及各項動作之時間，朝會後，各生即歸教室，九時開始上課，第一次課完畢後，全體休息，各班或舉行遊戲，或全體跳舞，廿分鐘後，開始上第二次課，十二時下課，十二時十分，全體教職員及學生，齊至食堂午膳。

學園之午餐，皆由學生主持辦理，普通科每班學生每星期為全校預備午餐一次，作為烹飪課程。每班舉領袖三人，佈置一切，所有食品，概由學生消費合作社供給，每次菜單，由學生委員會膳食部與教員擬定，午膳時，凡任烹飪之學生，皆為棟長，此外設領袖棟，由班長八人與計時員動作員分坐，以便討論本日全校之工作，食將畢，有各項報告，首由烹飪領袖，報告菜單項目，全餐費用，烹飪人員之姓名等，次由學生委員會，隨時報告關於全校學生生活之重要事件，或由學生消費合作社，報告營業狀況，或由任何同學，報告報紙上有趣之新聞，如有來賓，則請席間演說以助興。

午餐後，任烹飪之學生，則收拾食堂廚房與碗碟，其餘學生，除領袖外，則負灑掃之責，使全校整潔，同時各領袖及所推定翌日之領袖與教職員等，開領袖會議，討論翌日種種進行事項，與改良辦法，午後一時半，全校學生第三次上課，下午課程，多屬音樂，美術，體操等科，二時五十分下課，由計時員宣告放學，於是各生整理一切歸家，一部分學生，負有照顧校舍之責者，將全校窗戶門扇

等封鎖妥貼後，方始離校，此乃自由學園每日普通之狀況也。

(特點)以上各項報告，皆極簡略，作者未能就自由學園辦學之精神，盡量敘述，深以為憾，然以上之報告，表現自由學園之特點不少，其最著者有四：一獨立精神，二尊重學生人格，三提倡勞動，四注重實際生活，此四種特點，與杜威先生所主張之平民主義之教育，甚相符合，回顧我國私立之中學校，能具獨立精神，不受任何方面之牽制者，有幾？能尊重學生人格，使實地負責自治者，有幾？能提倡勞動，使學生親自操作者，有幾？能注重實際生活，使學生明瞭教育即生活者，有幾？統觀國內之中學，大都以課程為中心，以學分為標準，所注重者，多屬外表形式，彼此抄襲，互相仿效，而於教育之真諦，以及學生之實際生活，與精神修養，多不顧及，如此而望中等教育之改進，不亦可笑？今日欲求我國中等教育之改進，非痛洗因襲之弊，徹底改造不可，凡從事中等教育者，能具羽仁先生辦自由學園之勇敢，與堅決之意志，努力奮鬥，則我國中等教育，庶幾有望。

### 民衆教育通訊第一卷第九期要目

- 江蘇浙江南京三省市識字運動宣傳之比較……………教育部社  
會教育司
- 民衆教育館革命論……………徐朗秋
- 生字反復與民衆讀本……………宗秉新
- 民衆圖書館經營法……………徐旭
- 民衆戲劇概論……………閻哲吾
- (計劃)上海市立民衆教育館計劃大綱草案……………王義耕
- (報告)本館展覽部抗日中心展覽實施報告……………本館展覽部
- 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 (消息)一月來教育部民衆教育消息彙誌
- 一月來各省市民衆教育消息彙誌
- 一月來辦省民衆教育事業之進展
- 一月來本館各種活動事業之進行
- 參觀上海職業指導所及普益習藝所……………周振韶
- 本期消息索引……………編者
- 編輯後記……………編者
- 定價：每冊大洋一角二分全年十冊定價大洋一元
- (郵費在內)

發行：鎮江范公橋省立鎮江民衆教育館民衆教育通訊社



# 意大利教育制度的哲學背景

陳子明譯

——意大利佛羅稜斯高等教師學院院長 E. Codignola 原著——

## 第一篇 哲學的貢獻

### 國家教育問題之興起

——最初引起國家教育問題

而使之具有充分的意義與充分的意識者是十九世紀初年的庫奧科(Vincenzo Cuoco)。他第一次使意大利很清楚地自覺着她不僅是一個語言的和文學的實體(entirety)，而且是一個政治的實體，故其切要的工作是從自己固有的靈魂中去引出種種的勢力與方法，以建立真正自主的生存，換言之，即獨立的與統一的生活。因此在庫奧科領導之下，便開始了國家統一運動的工作。他著了一本書，名叫柏拉圖

在意大利(Palone in Italia)是一部假設柏拉圖和克利奧布拉斯(Cleobulus)(註一)住在Magna Graecia(註二)城市中時的幻想的通信，他欲藉此以灌輸拯救國家所必需的觀念給意大利國民。照他自己說，他志願要『造成意大利國民的公德心，及鼓舞團結的精神，愛國的熱情，以及他們向所缺乏之好爭的情感。』他將意大利比作一所頹廢的房屋，

從此貴族大廈的殘磚破瓦中應該建起一座嶄新的高樓。其實在十八世紀時，已有一種『內部的激動力』以及對於新生活的覺醒的徵兆，凡此皆趨向於意大利文化之解救者，不過始終沒有找到一條適當的固有的出路罷了。此種趨勢之形成實在是對於傳統的文化之失望及對於歐洲思潮尤其英法的思潮之接觸的結果，而由於原有的解放運動之受本國高壓勢力之摧殘者尙少。

韋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44)——庫

奧科的工作在性質上純粹是本國的，創始的。他是一種工具，以意大利最大的哲學家韋科的思想來重新振起意大利的智識生活。韋科生時與世隔絕，頗不爲人所知，因此爲人所忽畧者幾及百年，一直到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年完全創始新文化時，意大利纔真正的認識這位最偉大的思想家的哲學。他不特早已多少的預先看到後世康德(Kant)和黑格爾(Hegel)的哲學，而且他是麥啓雅衛里(Machiavelli)

(三)以後，意大利唯實主義的精神的思想家中之最好的代表。他是第一個人出來倡導，從統一運動到現在繼續流行着的歷史的理想主義是意大利最深奧的哲學的、歷史的、政治的、及教育的思想之靈魂。

韋科的貢獻在其對於笛卡兒的真理標準的批評：我們知道很清楚的東西不一定是真的，惟有我們自己建造的東西才是真的。「對於一件事物的知識的標準全在對於那件事物的執行。」惟有上帝纔能真正的了解自然，因為自然是他一手創造的。我們可以了解「自我」的確實性(Certainty)及笛卡兒從此中用幾何學的方法所演繹出來的一切原理，但是此種確實性不過是一種近似的知識，而不是科學。科學只有屬於上帝。從科學方面講，我們只能了解幾何學上的命題(Propositions)，因為這是我們所創造的。韋科到後來又放棄這種懷疑的地位，尤其是在他的名著 *Principi d'una Scienza Nuova d'Irorno alla comune Natura della Nazione* (1725)中，而且拓展其真理與事實相等的原理，使能包括整個的人類世界，或歷史世界。我們對於這種世界可以具有完全的知識，因為「當敘述事實者即為事實中

之主角時，歷史是最為確實的。」他雖然將人類心靈之創造的活動限制在歷史世界的範圍之內，他仍比笛卡兒更進一步，以歷史上的真實當為一種自我形成的過程。其實，正如笛卡兒之所主張，真理存於主位(Subject)，非存於抽象的隔絕的個體；比較起來，它還是存在於實現其自身於歷史過程中之人類的精神。韋科因此乃証實了精神自主的原理，此是笛卡兒之「思維」(Cogito)的最大假說，而且使它從一切偏見和個別化的抽象中解放出來，還它本來的面目。此種解放作用同時又保障權威(authority)和歷史的權利。

聽從傳說，很堅固的站在歷史的真實之安全的地位，不一定就如笛卡兒派及啓蒙時代的哲學家之所推想的必至屈服於外界的與無理性的權威。韋科是現代思想家中的第一個人，把歷史看作為心靈開展的一種自動的過程，為第一種真理升進到第二種真理的永久的攀緣，常常愈進而愈入於深奧的境地，又為笛卡兒所著重的個性及向為社會之基礎的權威這兩種東西，由於活動的高等的綜合，而進歸于其真正的本性的一種過程。因為他是以人類的世界為宇

宙及國體之綜合的第一個人，所以真正現代的政治的教育的思想可謂自從韋科開其端。綜合是順從其自己之內在的理性(天道)的，因此無論在那一方面看，歷史都是應當擁護的，其在內部推動其進步之內在的勢力也是應當澈底明瞭的。十九世紀所特有的歷史的精神在韋科時可謂第一次充分的表現。

從這一點觀察，韋科是笛卡兒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批評者，在他們雖有有力量的實際的武器，然而究不是了解人類及其真實之最深的本性的方法。笛卡兒主義的真理標準及其對於知覺的觀念足以使一切健全教育之根基完全推翻。它以個人的判斷替代了人類的公意及權威。它在教育上所指示我們的途徑是與自然教育適相反對的。

笛卡兒派的哲學家把一類莊重的名詞，與「論証」，「証據」，及「証實的真理」等等灌注到一般青年的腦筋裡去，好像是一待他們離開學院的門牆，即可以找到由線、數目、及種種代數的形式所組成之人類的世界的樣子。凡是大家所贊同的，彼等則竭力反對，其實此種東西常為真理的來源，因其呈現於大多數人之目

前者無不真實，皆足資為最安全的楷模，如在政治家之執行職務，軍官之指揮隊伍，律師之討論案件，審判官之裁判訟案，醫生之治療疾病，神學家之救濟其心上的悲苦；總之，此種楷模足以使大多數人之有各種缺陷者皆得到相當的滿足。

照這種方法，「現在的論理學家」便忘記了一般的人都是只有記憶與想像，很少是有心靈的。他們又忘記了一個入必須先學習，後判斷，最後才推推理。他們把學習的正常次序完全顛倒過來。而且在事實上，他們不先鎮靜的逐步的遵循着觀念之自然的程序，用適宜的方法去調整與激刺青年的心靈之一切的事實，用語言的研究去訓練記憶，從詩文及歷史的閱讀中去培養想像力，用幾何學去發展其才具，總之，他們不知道以青年人之豐富的有力量的想像力為出發點，慢慢地去達到成年人所特別發展的推理力的練習，他們馬上就想引導兒童到真理與批評方法的途徑，換言之，即在兒童未能充分理解之前，便教以如何判斷的方法。

這種方法的結果便是懷疑主義的流傳。「製造中的真

理，所以聯絡懷疑的對象如人者，足以使人傾向於一切專爲自身之快樂與功利的動機，」那即是說，趨向於毫無約束的自我主義，那種自我主義足以解散社會的聯繫而引人重返於禽獸隔絕的境界；各人成爲自己的楷模，而「學者之深奧的智慧，本應予通俗的智慧以扶助者，乃反而盡力摧殘之。」從這種在「發展上毫無好結果的」學校出來的青年，「一無所成，祇知對任何事物皆妄加評判。」其實，養成得太早的批評的習慣足以阻止人跑上獲得人生之真智的大道，而此固爲常識的藝術，使各人「當緊急事件發生時能隨機應變」而得到拯救者也。

同樣的精神生活上之直覺對於韋科政治思想之偉大的創始性亦有重大的責任。現代的國家理想已經蘊藏於一般人民意識之內者，常隨此種意識本身之改變而改變，以及法律之歷史性的直覺，凡此種種皆首先出現於韋科。像如下之公理，「政府應依合被治者的性質」「本地的風俗不能一齊驟然改變，應該經過長久的時期慢慢地改過來」，「風俗比較法律爲有價值」，其所含的政治思想遠勝於改革派及光明的革命運動者所持之理論，實爲十九世紀國家與

法律之有機及進化說所造成之偉績的前導。

前面已經說過，韋科在當時並不爲世人所了解，即庫奧科亦以其工作爲只是對於歷史、政治及教育的研究之貢獻，而非對於推理的思想的貢獻。韋科對於思想上的貢獻一直等到司怕文達 (Pierandrea Spaventa) 及得桑特士 (Francesco de Sanctis)，尤其是克洛西 (Benedetto Croce) 及香第爾 (Giovanni Gentile) 的時候始在現代哲學史上顯示其真正的意義。

庫奧科 (Vincenzo Cuoco 1770—1822)——庫奧科研究韋科的哲學所得到的訓練使他站在一個最適宜的地位，從自己曾經參與過，深思過，而又可爲証人的事件中得到最爲明斷的結論。他的傑作 *Saggio Storico Sulla Rivoluzione napoletana del 1799* (Milan, 1801) 是從經驗直接得來的結果。在革命期中，他曾經寫了許多著名的書信給羅梭 (Vincenzo Russo)，討論如何根據法蘭西在一七九五所制定的憲法來編制尼阿波里坦共和國 (Neapolitan Republic) 的國憲。他在此處直接地攻擊啓蒙時代政治的觀念論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Enlightenment) 之反歷史的抽象說，

而盡力宣傳政治學上一切有生機的政體都是自發的，如同其他一切人類活動之表現一樣。「永久的憲法是人民自己制成的，」不是用暴力勉強而成，也不是從理智上演進成功的。「憲法必須爲人而定，故事實上總難免有許多缺點與錯誤。」尼阿波里坦的革命是從人民的靈魂中湧現出來，故立法者應該依從他所欲轉移的國民的傳統。因爲「革命之惟一最大主動者」是人民，所以凡是不能在教育上表現其自身的政治動作簡直無存在之餘地。照韋科的意思，教育「應該提起而且扶助一般弱者與顛連無告者。教育不應該把人從其本性中強奪出來，也不應該棄置他使留在墜落的境地；」應該從真實的情況上進行從而運用之。經過教育的訓練，應該引起一種「公衆的精神」以及國民的自尊心，因爲這是國民所賴以生存的東西。

鑑於十八世紀後半期意大利王子所發動的改革之失敗；眼見着由於第一次革命運動之壓制所得到的謬誤的印象，因爲這次革命的發動原非由於人民之任何需要與衝動，而是受了少數民主黨及共和黨人之煽惑與指揮，而此黨人

又非對於國民之內在的生存有若何的感悟，不過是受着法蘭西學說的影响；而又看見拿破崙的獨裁主義；因此庫科乃得到一種結論；意大利惟有靠她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出來；專門盼望着他人的援助是沒有用的。解放的第一種武器必定是意大利人民的教育。庫奧科的 *Saggio storico* 爲政治思想界開闢一條新路，而復興的國民意識與統一的觀念皆從此得其援助與動力。在法蘭西的強佔之後，庫奧科乃卜居於米蘭 (Milan)，藉 *the Giornale Italiano* 爲媒介，「努力使意大利人的心靈要有高貴的思想，絲毫不露形跡的引導他們獲得新命運所必需的觀念，又使各省居民曾具有國民的意識。」他在報紙上的短文裡說：

在此種計劃中，我以為要使凡是屬於意大利到全部的東西皆呈現於意大利共和國人民心靈之前，是十分有用的。假如我們論及顯達的人，就令他們常常懷想到意大利境內的光榮。假如我們要談到有用的事業，就令此種小冊子爲全意大利之普遍的中心與貯藏。

他回到那不列斯 (Naples)，在國王波那伯脫 (Joseph

Bonaparte) 與繆拉 (Murat) 之下，擢升為國家最高級的官吏，為普及教育委員之一。約在二八〇九年他將所著 *Rapporto e Progetto di decreto Per l'ordinamento della Pubblica Istruzione nel regno di Napoli* 呈獻給繆拉。此種計劃在意大利教育史上佔一極重要的位置，因其不特為尼亞波里坦共和國教育之基礎，且為第一次試用學校之具體的組織，以期發展國民的意識。他所建立的根基即為後來國民教育的政策。

沒有教育，則最好的法律也無所用。這種法律儘可以訂立下來，可是惟有藉教育的力量纔能使之深印於人心。惟有教育纔能恢復我們古代的偉大與光榮。自然已予我們以一切的資產；而我們所缺少的是工業，那便是，了解及應用此種資產的能力；而此，則惟有教育纔能給予我們。

所需要者是一種公同的文化，此種文化不是抽象的、學術的，而是具體的、活的，并須能依合於它所要喚醒的人民的靈魂，——換言之，要有用。要使教育能切於實用，第一須廣博，即是要能包括一切的科學與文藝；第二須

普及，即是要供給大家以受教育的機會，但是不必大家都受同樣的教育，——為多數人者是一種，為少數人者又是一種，小學教育完全免費，中學教育則須減至最低的費用；第三須劃一，因為劃一纔易辦而成效大，欲保證進步又須藉助於普遍的輔導以及教科用書之定期的修訂。學校的內部工作應該無所不包，舉凡文學的，科學的，道德的，及政治的教育皆須齊備，惟國家對於宗教教育不應加以干涉。最後，教育的機會應該推及於婦女，因為「婦女如受教育，則男子教育之成功可謂已達其半」。

在庫奧科及當時一般人的意見，以為小學應該是自主的，不應僅為中學的預備；小學的目的應為發展基本的政治的與國民的意識，此乃庫奧科以為自經法蘭西革命所促成之社會改革以後，人人之所必須具有者。當時的信念，以為國家應厚植其根蒂於全體國民意識之中，然後始能團結而強固，因此普及教育便成為現代國家一種最重要的功能。國家之不能放棄此種功能，正如其不能放棄其自身所以存在之深奧的理由一樣。

對於小學教育的性質，庫奧科與其法國教師之意完全

不同，而偏向於章科。

詩歌與寓言，對於兒童之心靈及想像所發生之效力，較任何理論的文字為大。假如古人的教育果真優於吾人者，則其故或由於古人很早便把他們的真正詩人之作品放在青年的手中。在古人看來，詩人纔是青年之一等的導師。詩人之效力最為偉大，因彼能直接訴之於想像及感官，而此固為兒童之惟一活動的心能。我們對於這種心能，只知用死的語文之乾燥無味的法則、最為不近人情的殘酷、以及毫無意義的修詞學以壓抑之，然後我們纔怨恨着我們教育的結果只能造就十分少數的偉大學者。

要使道德的教學發生效力，惟有使之與活人的興趣相聯繫，且須使其性質具體而切實。「假如我們真正的要造成一個軍國民，則讓我們去教育兒童。他們在兒童時代所受到的教訓往往是最有效力的。」

中學教育，在庫奧科的計劃中已失其教會的及狹隘的人文主義的性質，變為一種靈活的教育制度，用以促成社會上一般領導階級之完滿發展者。在人文方面，頗致力於

科學及史地。這種學校的工作，「第一是增進一般想在科學方面求進步者之教育的資質；第二是教授學生離校返家後最為適用的科目。」

善以指導的教育，其目的不在於教授一二真實的觀念，而在于鼓舞學生愛好科目的熱情，使其心靈對於此種科目能有更大的理解的能力。我們也可以說，這不但是編制一本書的問題，而是造就一個人的問題，真正被動的人好像是一本書，因為他所保持者只是人家所給他的幾個觀念，同時，心靈的性質是活動的、創造的、能够發展觀念的、能够組織觀念的，總一句話，心靈是知道如何統御與控制觀念的。

因此他反對教授詩學，修詞學，論理學，及作詩的方法，而極主張直接閱讀古代文學，使青年人能於早年期間「感覺到偉大的模範作品之美麗而摹倣之，」有了這種基礎，他們將來在大學時可以「懷念他們自己的觀感。」

關於大學改革的提議，庫奧科較少創始的見解，其主要之點多依照一八〇六年拿破侖改革案（the Napoleonic reform of 1806）所特有的功利的標準。其惟一獨到之處是

提議在文哲學院中設立兩個新的講座，其一是萬國語言學，又其一為雄辯語言學。

#### 復興時期及統一運動時期之國家教育問題

使意大利成爲一個自治的國家，此種願望，在拿破侖統治之後期已經顯露，到拿破侖帝國推倒，舊時的專制政府復興後尤爲明顯。惟此種願望卒至消沉，庫奧科之影響亦因而消散，而政府的計劃亦卒爲所棄。惟其所倡導之原則與堅強的信念則始終存在，彼以爲任何有機的或集合的發展必須具有自動性與創始性，故須征服內部的自由，始能使意大利乘藉其自己的力量而達於獲得政治的自由與統一之境地，——而此即成爲自馬志尼與喬培特(Mazzini and Joheri)一直到加富爾，得桑特士，以及斯怕文達兄弟(Francesco De Sanctis. and the two Spaventa brothers)等最偉大的思想家之福音。藉着一枝筆鋒的力量與此身殉國的精神以促成國家之統一運動者就是他們。

自一八一四年後，接着是政治的復興，中等階級的組織，雖在拿破崙時代已經成立，而尤以在北意大利及意大利王國爲最發達，至此卒爲反動勢力所摧殘。不過他們並

不因此灰心，仍然慢慢地艱難地重新組織起來，不與專制的政府合作，惟準備着藉用組織政黨及表示溫和的反抗或革命的開始運動以拯救其祖國。大多數的官立學校已經恢復舊觀，而落於僧俗尤其是耶穌會人之手。這些學校與國內正在活躍的潮流愈趨愈遠，而此種潮流對於復興的政治所認爲最足以指導文化機關的觀念常施以隱約的或明顯的反抗。

#### 意大利復興時期的學校

正在王子的復興運動

之後，起了一種最無意識的強烈的反動。此種反動時起時伏，然在每次革命舉義之後，只有愈趨愈烈，自一八二〇年以後，無有寧日，幾以鮮血染紅了意大利。

此時之最爲特殊的公文是一八二四年八月廿八日的教皇訓諭，此乃與教王國中之學科條例相伴而來者。

你應以全副心腸，全副靈魂，全副心靈去愛戴你主上帝；又應愛你的隣居如同自己。因爲一切事物的原因皆在於創造者上帝，故我們須研究物理學；因爲善良的與誠實的生活之方式皆來自對於可以接受愛情的事物之親愛，即是對於上帝及個人的隣居，故須研究倫



理學；因為惟有上帝才是理性的靈魂之真與光，故須研究論理學；因為惟有在誠信的基礎及與其聯結上，我們纔能建築堅固與保護周全，故對於共和國之應加讚美的自衛，亦須加以研究。

教育的情境全為耶穌會教徒所統治，在整個的統一運動時期中，此種人對於神權政治的觀念始終最為擁護，而對於一切與天主教主義相調解以求獲得較多的政治的自由之舉動，彼等無不竭力反對。他們不剛是統治了教王國及那不列斯王國內的教育事業，且其對於任何喚醒國家意識之舉動的反對大足以影響其餘各國。他們對於大學比較對於中學監視得更加利害；自由觀念的壓抑及對於政府和反動勢力之懷疑的空氣使一般學生流入於一種反抗的精神，蓋彼等對於所受教訓頗覺其無用也。真正的現代大學制度一直到意大利統一之後纔發達起來。然而損傷最甚的還是公立學校；此等學校在過去毫無承襲一如中等學校，不過是最近創辦起來的，尙未厚植其根基，行政管理殊不完善；教學方法不特無益而且有害，其所着重者全在於機械的練習。普及教育仍被視為引入覆亡與社會紛亂的一種動力

，引用朗勃魯希尼的話，大多數的人仍然迷信着「每個字母如果走進了下層階級兒童的腦筋中，即變為一把斧頭或一根棍棒，有時有日，他總會利用這種武器去破開富人的錢櫃與拆毀君主的寶座。」

哲學與國家意識的發展

——吾人精神勢力的復活

已經準備好意大利的政治解放，其終極的結果，往往如此的，喚醒了一種較為堅實的本國的哲學意識。自從一八一五年以後，有一種精神上的反動力，是從本國的宗教傳統中接受其滋養與衝動的，突然衝破了法蘭西思想的羈絆，尤其是在北意大利境內。天主教主義，向為百科全書派及法國革命所指為封建的專制主義之同盟者，今又復活於一般人之心中，蓋此等人曾為十八世紀之觀念論所產生的空虛與精神上的萎縮所欺騙，而又目覩革命的擾亂及拿破崙戰爭所促成之遍地頹廢的景象，而深受感動者。天主教主義到現在已被公佈為一種自由主義，極力謀與革命所引起之最自由的政治與社會的願望相調解。此種宗教的復活足為心靈的權力之明証，而此固為威官主義及功利主義所否

認者。它又是國家自治的明証，是品性的重新調合，以爲拯救祖國之必要條件。內在的世界之重新建立是需要的，然欲完成此種工作，惟有在一切人民的心坎中燃點着有絕對價值的誠信，調合他們的心靈，使能運用調協而堅實，以爲反抗與犧牲的準備。可是這種誠信並不是人人都把它和天主教主義合而爲一；譬如，馬志尼便建立一種自然神主義（Deism）以相對抗，頗與盧騷相似。不過，這種人人所從出發的假定（Presupposition）對於因襲的信念是大有裨益的。

此種運動極難指爲即是返於因襲的信念，如羅斯美尼（Rosmini）、曼蘇尼（Manzoni）、卡坡尼（Caporini）、朗勃魯希尼（Lamborghini）、及喬培特（Jobert）俱是如此。他們是主觀論者，又是自由黨人，甚至常常在那裡堅執着必須恢復絕對真理的崇拜，要把爲十八世紀哲學所推翻的權威放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上，天主教主義之重要的因素仍然是心靈活動中之堅強的信仰，并且堅持着心性之自由練習是無可轉移的、由外力強制而成的一切權威的形式是必須拒絕的。其實，這是前一世紀之被人憎惡的理性主義的遺

傳。從這種意義上看，我們的宗教復活的基本思想，至少在最能代表這種精神的作者是如此，比較百科全書主義的觀念論的後裔甚至馬志尼所倡導者要算切合於現代而革命得多了。

此種運動之確實的需要，即是將社會生活、哲學、教育、和政治一齊附麗在宗教之後，不一定就是重返於過去。在羅斯美尼，曼蘇尼，朗勃魯希尼，和喬培特諸人之意，宗教並不是對於外界權威的降服，而是心靈之最深奧的需要的滿足；故宗教是無上的自由。這般思想家又以爲宗教復活的概念與天主教改革的概念是不可分解的事實，而即所以使宗教與現代合法的自由的要求互相調解者。

羅斯美尼（Antonio Rosmini, 1797—1855）——在羅斯美尼之意，第一次對於十八世紀的反動得到充分的有意識的表現，而且經過幾世紀的隔絕以後，意大利哲學又復與歐洲的趨勢相調解。羅斯美尼覺得應該建立道德律的絕對性以便和個人的自由意志及享樂的天性之權利相對抗。他於反對經驗主義的哲學之後，即建立天主教主義以爲人類心靈惟一安全之避難所，在懷疑與拒絕之激擾的懸望中

後心靈可以在此安心休息。他雖然受了康德的影響，可是他不能接受康德的解決法，他認為這是主觀主義的，不能保證真實或對象的實效。他只以一種生存之觀念來替代康德的十二範疇，以為這是任何思想的對象之必要的實位 (Predicato)，他以為這是客觀的，與康德的範疇之主觀性適相反對。此種客觀的觀念為主位 (Subject) 所直覺地感覺到，不是從他自己的心靈中抽引出來的。可是在實際上，羅斯美尼的位置，因欲與康德的位置等量齊觀，乃即此終止，因為，在一方面，說康德的範疇是主觀的未必對，在另一方面，說生存之觀念可由思想直覺地和客觀地所感知也未必是對的。

羅斯美尼第一次發表其在教育上的新趨向於一小冊名 *Unità dell' Educazione* (1826)。他反對啓蒙運動之原子論的個人主義 (Atomistic individualism of the Enlightenment)，主張要把心靈降服於超越個人意識的權威之下，以恢復其統一。統一是在「教育上第一條不移的定律」，惟有天主教主義纔能把它建立在意識之中，供給一種他所欲看見的目標的統一。而且，教義的統一 (Doctrinal unity) 可以給予

學說以一種活動的、諸和的、有機體，同時實証主義 (Positivism) 之分裂的科學足以使人空虛、無知識、沒有一種足以包羅萬有而又可以聯絡及統一所有知識之單一的觀念。這樣的統一足以促進一切權力之諸和的、有秩序的發展，「以追求及參與完全命定人類的至善。」

羅斯美尼在其所著 *Giugno Piaghe della Santa Chiesa* 書中批評權威之因襲的天主教的觀念至為激烈，認為與笛卡兒的個人主義同是權威的品質之摧殘者。教堂必須脫離孤獨的情境，重與現世相調合；教士必須恢復其已失的威信，惟欲達到此種境地，崇拜與禮儀必須精神化，尤須有更加充分的文化與教育，使能與普通人站在同等高貴的地位。對於精神生活之同樣的直覺把「圓滿而生動的教育」之豐富的概念提示給羅斯美尼，此種概念的根基是建立在誠信的需要之上，而不在於教義之嚴酷的、專斷的客觀性。剛是啓迪理智是不够的；必須同時激動心情。這是自從經院學派以來一般學者所不能了解的東西。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一般學校只能養成編狹的、受束縛的品性，使學生脫離普通人士而獨自構成一種階級，死守着推理上之精妙

的形式。「凡是不能說話廣博而使人動聽的，凡是不能依着個人之所好而充分表現其人格的，凡是不能隨意引証真理以使人愛好的，都不是真正的教師。」

羅斯美尼最偉大的教育著作是 *Del Supremo Principi odella Metodica e di Alcune Sue Applicazione in Servizio dell' Umana Educazio e*，此書他於一八三九年開始著述，到一八五七年他死後纔出版。他試在遺本書裡發現一種方法為人人所能了解而且接收者。這樣的方法必須根據于最高的原則。他和盧騷一樣，深深地信仰着「人類的理知具有一種為本性所預先確定的發展的途徑；除非超出此種途徑之上，它是不會進步的。此種途徑必須以心靈對象之自然的、必要的次序為模範，因為精神活動之規範(Norm)在對象(Object)，而不在主體(Subject)。他將教學的藝術之最高的定律綜合成下述的原則：「思想是可以當作實質之用，或為另一思想準備實質的。」因此，「最初提示於兒童之心靈者(我們也可以說，提示於一般人的心靈者)須屬於第二層觀念的對象，然後是屬於第三層觀念者，如此繼續下去。」此種在知識作用中知識及其定律之位置在前

的客觀的假定使羅斯美尼的方法論印上嚴刻的定命論的和專斷的特色。正如香第爾(Tenlie)在他的批評裡所說，「每個健全的教育觀念，若看做一種活動的心理過程，此種過程即是知識之所由發生者，繩之以此種概念，乃不可通。」

喬培特(Vincenzo Gioberti, 1801—1852)——喬培特的出發點是確定的反對笛卡兒及現代的哲學。此種對於笛卡兒哲學的擯棄沒有包含其學說之最重要的方面——心靈自動的概念，還算是它的反面或是此種概念之不充分的表述，即是使「推理」和有限的、經驗的、個人的理知——可以使自由流為放縱，使人類降為禽獸的理知——恒久不易的合而為一。像韋科一樣，他感覺得主張自由不一定就是反對權威；傳統與歷史也和我們的心靈一樣是神聖的事業；真實的東西往往是這兩種極端的綜合。文化的創造其由於外力之影響者一如心靈之影響。其實，人是自由的，因為自動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根源，但是亦只能在歷史之內自由，而不能超乎其外；他的自由應依着理性之指導，而不能隨着個人的自由意志與怪想。傳統必須復活，而不能

擯棄。自由起於權威，凡是不明此種事實者，其根基必不穩固。

在羅斯美尼的哲學方面，喬培特反對其對於真實之靜的概念，他提出一種動的直覺以相對抗，以為惟此足以說明歷史。歷史的意義在他是很清楚的，惟在其師羅斯美尼則甚模糊。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喬培特要以真實的、具體的、生存主宰或創造者之直覺來替代抽象的生存觀念，這是顯示於心靈之前的第一條真理，一方面可以保證真實的客觀性，另一方面可以保證個人的自動，而此所謂個人者在他設想是創造事業上的同事或共同創造者。不應該把上帝貶謫到一種超越的、神秘的、幻想的境界。他在人類意識及歷史中顯示其存在。「個人真正是觀念的實在化 (individualization)，同時，觀念也是個人的實在化。」

在喬培特的心靈中，他的發展極足以反映那個時代之精神的發展，所有幻想、轉機、以及比較成熟的政治的與教育的意識之最後的勝利無不如此。自從韋科，庫奧科以來意大利的傳統之重要的動機慢慢地鎔化於其心靈之中，直到他建立一種在意大利思想史上最具有內在的創造性的學

說。藉着喬培特的力量，意大利卒從教會的軀壳中蛻成其世俗思想之完全的解放，如羅斯美尼以及所謂天主教主義與自由主義調合而成之整個的政治學派，名為新鳩爾弗者 (Neo-Juelfo) 無不受此種教會勢力之束縛。在他的天主教主義中不再見有什麼神秘的或避世的東西；它是歷史上精神生活中之最為具體者。哲學也不再附屬於歷史之下，完全從它自己的靈魂中產生啓示。哲學是「獨立的，天主教的權威不能反對這一點，因為天主教主義和基督教俱以哲學 (理性 Reason) 為基礎，故哲學變為獨立的，高貴的。」

「為求依合神秘，哲學應該「降級」，這是真的，但是，服從自己所建立的勢力事實上即是服從自己。」

喬培特如同庫奧科一樣，其中心興趣總是屬於政治的與教育的方面。意大利復興的問題，自他年青時起即已燒紅了他的心靈，很早就使得他深思着他的國家在政治上所以受人宰制的理由及其解救的條件。他追隨着庫奧科的原則，反復地申明，欲謀意大利政治的拯救，若不從一般渴望此種拯救的人民之心靈與意志方面去下手，是沒有用的。「良善的行為，除非出於天性與自動，絕不能以人力致

之，若欲求之於外界，那是最荒謬的事情。」對於意大利人之內在的心境及其道德的頹落必須求一救濟之方；其困難之根源不在於外勢的勢力，而在於人民自身。因此，政治的拯救根本上是一個教育的問題。「除非意大利人先熟習於運用思想，他們是永遠不會行動的。」任何進步，只有一種來源，即是思想之創造力。退步的原則也只有一種，即是思想之軟弱。「因此，哲學思想之自由的使用是文化的開端、運用、及最有效力的激勵，這是哲學家所以為思想之前驅的原因。」但是，思想不能止是理知的練習；它必須佔有整個的人並須變成宗教，或與宗教成爲一體。這樣的思想馬上就成爲意志與行動。「我們國家之最大的病根還不在於知識之缺乏，而在於缺乏一種精神、勇氣、熱血、尤其是誠信。有了誠信，什麼事都可以做，沒有誠信，則無事可爲。」

喬培特之整個生活的目的在於喚醒國家的意識，他知道這種工作若不從意大利之真實的情境出發，絕無成功的希望。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第一時期的著作 *Del Primato o morale a civile degli Italiani* 和後來的 *Rinnovamento*

*Civile di Italia*，其中心思想是始終一貫的，正如在那個時代中，從羅斯美尼之新鳩爾弗主義過渡到加富爾的自由主義之始終一貫是一樣。他的 *Primato* 把國內一切傳統的勢力提高，希望把意大利各邦聯成一個大同盟，擁戴教皇爲首領，並且將意大利生活中之各種因素一律調協起來。這篇論文當然是失敗的，因爲它從一個不穩固的假設出發，——天主教主義與現代文化之調協的可能性，有世界權力的教皇權與一個單獨的國家之調協的可能性。雖然如此，*Primato* 一書對於意大利國家意識之形成却發生極大的效力。他在 *Rinnovamento* 一書裡極力扶助意大利諸侯聯盟加入沙俄王室 (*House of Sanyoy*) 所建立之君主聯合，因爲這個王室曾經證明其在軍事上最有訓練，而對於自由的精神又最爲信仰。喬培特在這種工作上已有先見之明，將新興意大利國之基礎描得其外形。僧侶的職司應回復到純粹精神上的功用。教堂應恢復原來的情形，其對於現世之權 (*Temporal Power*) 應即撤廢。教育應完全付託於國家，故應還俗。政治的改革應以「普通人民之拯救」爲出發點，即是從下層階級之充分的教育及其經濟狀況之改善

出發。教育應由國家設置，至少初等教育應該免費，這不僅僅是人道與正義的要求，而且是自由生活的基礎。

因為自由是依知識之分量而測定的，沒有政治知識的人不能獲得任何的政治自由，有之亦不過是表面上的形式而已。……此種政治的自由為人民主權之一部分，所有文明各國無不認此種自由之運用為人類政治思想表現之形式且為一切貴族之最重要的根基，若乃將此運用之權完全剝奪，而猶高談人民之主權豈不矛盾可笑？

天主教的改革與朗勃魯希尼(The Catholic Reform and Raffaele Lambruschini. 1788—1873)——在意大利，除北方和南方的思想家之外，還有一組塔司干(Tuscan)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們對於意大利國家意識之造成也佔一重要的位置，朗勃魯希尼和卡坡尼兩氏便是其中的首領。這一組人比較的不宜於哲學的討論，因其缺乏充實的準備。事實上，他們反而傾向於對哲學取懷疑的態度。雖然如此，他們在國內仍是最有效力的教師，因為他們富有宗教的熱誠，以為其著述活動及政治活動的滋養品，又因為他們曾經

嘗試(雖然失敗了)促進教堂內部的改革，使與現代精神的要求較易調解。在這一組人之中，朗勃魯希尼是供獻其全部生活於教育的。從一八三六年到一八四五年之間，他是非格里尼(Figini)附近聖西爾邦(S. Verdone)地方一間著名的教育研究所的指導員，又是一種最通行的教育評論名(Vida dell' Educatore e Lettere Per i Fanciulli)的編輯，這是統一運動時期中教育學說之最有價值的表現。他將他的教育活動的成績收集在下列幾本書裡：教育論(Della Educazione, 1849)、教學法(Dell' Istruzione, 1871)及 Della Virtù a dei Vizi (1873)。其實要找他的真正有創見的作品須到他一本不完全的死後才出版的書名—Pensieri di un Solitario, 和幾篇勇敢的與卡坡尼的通信裡去找，在他的專門的教育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因為為着利害的關係(他是一個牧師)，他不能在此書中發表其對於宗教生活的直覺。

他的全部教育學說之最有精神的原則(the animating Principle)是一種深奧的創始的權威的概念，尤其是屬於宗教的權威。他設法藉教育的力量重新建立已為理性主義所摧殘之宗教的權威，重新要求已為感官主義所否認之心靈

的自由。朗氏到宗教權威的概念中去找尋調解，因其足以保護信仰者之自主權。「拯救是在教堂裡的，我們的責任在於成爲此種教堂中之一位活的會員，從精神及真理上去崇拜。」但是僧侶的態度必須改變。「他的謬誤倒不在於欲與歷代的進步並駕齊驅。其謬誤乃在於逢著它所順遂的時代，僧家的權力可以大放光明的時候，它便就此止步不前了，同時本著福音以救世的宗教之光也從此沒落。」每一個時代有其語言；故教堂如欲說話使人信服，必須使其語言「及時」。天主教主義爲「活的靈魂」所組成，只能爲一種對於真理之自動的依附，如其本身曾經出自內心，則此種真理不妨由於外鑠。它只能爲人類本性之自由的顯示，而此種本性根本上是自動的。「外界的定律如能有利或有助於內在的真心，自由便可以存在。換句話說，自由是正直的真心之優勝。」

這是一種深奧的有能力的權威的概念，因爲它同時還可以保證宗教的傳統之權利。它不特將宗教生活的實際改變成爲一種自我發展之有力的方法，因而把教堂與虔信者之間的一切關係皆成爲精神化，而且從更爲深奧的人類的

觀點確証盧騷所宣傳之消極教育的真理，因而使一切教育問題皆得到一種新的見解。雖在嚴格的宗教教育中，學生仍爲過程的中心。因此，與信仰者之生活互相混雜的規範與誠律，如欲其發生效力，亦必須具有一種內部的回響。換句話說，原則是不能夠從外界傳進來的。相信我們能夠以抽象的原則爲工具去影響人，簡直是一種幻想；普通的原則，惟有變成具體以後，才能指導人。所以普通的誠律，必須依照各種不同的情境，去適應接受者個人之具體的傾向，不宜以其嚴酷的抽象的性質強制執行。至此可知宗教教育即是從內裡付與一切心靈的權力，陶鑄之使成爲有秩序的、調協的形式，而爲其本性之所渴望者。

這種精神自動的概念使其純粹的教育著作具有創始的性質，雖然是隱藏在內，並非明顯地發展出來；他又使其最簡單的提示具有具體、直接，以及個人經驗的風味，這是許多最著名的現代教育著作家所沒有的。此種教育功用之親切與具體的性質必然的拒絕教育的實際成爲一種規範的科學(Normative Science)。一個心靈影響又一個心靈的秘訣完全在於學習者之內部的傾向，因爲他才是他的知識



以及他的道德與宗教的產生者。惟有能够對人說話的人，繼能教育他們。他的語言往往是原來的，不能用定義來減縮為綱要的或預定的模範。抽象的考察起來，沒有什麼模範其本身是妥當的：「模範中的模範是良心。」朗勃魯希尼將他所有的努力皆趨向於使教育者對於每種教育的設施皆感覺其創始性，使其藉着不辭勞苦的訓練和內部的教育，感覺有繼續不已的以自己的權威為教師的必要，又須顧到他的權責所在，同時即是他的最大的義務，必須用上帝的名義傳佈上帝所深印人心的普遍的真理。學生的自治必須保護着，教師的權威必須與學生相適應，而不能強加其上。

在他的教學法 (*Dei Istruzione*) 一書裡，朗勃魯希尼曾經嘗試過要從心靈自動的概念中去演繹出一種方法論來，還在當時是很特別的。這種嘗試當然是失敗了，因為他對於知識缺乏一種有組織的批評的和深切的理解。他的惟一的真正的活的教育原則只能得之於散亂在各種刊物——尤其是教育評論 *Guida* 中的經驗的無系統的提示，這些都是從他做教師時之直接經驗中寫出來的。

卡坡尼 (*Cino Caproni*) 與偽教育學說之批評。——塔

斯干教育讚揚又一位宏偉的著作家卡坡尼 (1792—1876)，他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者，*Vivenseux* *Antologia* 和 *Archivistorico Italiano* 的創始者，在他自己的故鄉塔斯干尼的地方，他是關於意大利國民性之一切運動的不辭勞苦的復興者與促進者。由於他的學術的深研，政治的見解，以及教育的差委，他比任何人都來得高強，卒能促進塔斯干尼與其母國之重行聯合。他在一八四五年出版了一本不署名的著作名 *Frammento sul' Educazione*，這本書使他在意大利教育思想史上佔一個卓越的地位。他對於教育學說和教育制度都有澈底的了解，他曾到法蘭西、瑞士、德意志和英格蘭各地去旅行，藉以研求各國教育的制度；他對於所研究的東西具有一種犀利的批評的意見與健全的懷疑的精神，因此使他超出於流俗的見解。

卡坡尼之批評的眼光使得他發現出在盧騷的嚴格的、個人主義的、教育的福音中，因為沒有統一的中心，所以實質上缺乏組織，就是當時的大師裴斯脫洛齊 (*Pestalozzi*) 亦難免多少患此毛病。他又看到在有力的方法論中已經潛藏着死亡的種子，這些東西都是受着愛彌兒 (*Emile*) 的影

响，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到處盛開鮮花，如在 Aporis's Manuale(1833)和 Guida(1838)，Rosmini's Supremo Principio(1839—)，Parravicini's Manuale di Pedagogia Methodica(1842)，以及 Rosi's Manuale di Scuola Preparatoria(1844)。他人所稱為現代思想中之奇特的成績者，他反而解釋為(其實是如此)是缺少精神力或活力的明証。「一個更有力而且更能自信的時代決然不會如此關顧着兒童，其所以毋須如此者，因為要使兒童長育良好，儘可委之於模稜(Examples)的功能，藉着行為的力量，定然會使他們印上相當的形式。」

依卡坡尼的意見，方法上之無生氣的字句及機械主義的藝術起於偉大的指導的觀念之墮落與朦昧，而此固為歷世紀來曾經光照人類所遵循的途徑，而其本身亦常足以「滲透全時代或全世紀之人心者。」每當誠信消沉及吾人不能設法促進與助力時，虛偽的崇拜便起來了。耶蘇會的教育是虛偽的。愛彌兒教育上之專橫的自動主義是虛偽的。我們盲目的付託於方法，我們使「教育自身成爲一種藝術，一種書本上的藝術」，都是虛偽的。

卡坡尼的意思並不是說，過去的一切都好，現在的一切都壞。現代的生活要改組成爲一種新的統一體，比較舊的生活來得豐富些或者還要諸和些。可是我們仍舊是在一個轉機和過度的時代(卡坡尼重申聖西蒙 Saint-Simon，拉梅內 Lamennais，馬志尼，及其他時人之意)，沒有誠信是不能有真正的教育的。道德教育只能在有組織的人道的時期中完成，此在當時已成爲聖西蒙主義之家常便飯。他是澈底的浸潤於革命之道德的及教育的福音之內在的真理中，不過他始終不曾看出此種真理將引導到什麼地方。

因爲人類已經知道這種事實，卽是自己的尊嚴完全在於自己的本身，所以無論最初是主人、奴僕、或仇敵都好，他們之自視其本身是一樣的。教育的特權，當初是一種榮耀，縱使不是有力者所獨有的武器，到現在便成爲人人所應有的普通權利及人類遺傳。

假如這樣的一種平等應有一個原則來聯繫它，假如在一致的意志之外，應有一條如同從前上帝降臨給大衆一樣的規律，那麼世界就可以知道要遵循什麼途徑；然後新建設起來的人類社會將有一種生命傳遞給後

畫。

。究竟這種有生氣的規律是什麼，卡坡尼自己並不知道。

現代懷疑主義的這種位置對於行動之刺激不見得最爲便利，不過足以使他超出於黨派紛爭之上，磨練他批評的眼光。他的 *Frammento*，雖然似乎有時對他那個時代不很公平，同時把過去理想化得太利害，無論如何，從其內在的志願上看，是反對一切機械主義的形式及一切虛偽的聯結之自由精神的有力的抗議。即在提高古人方面，卡坡尼也確實維持心靈之自動與具體性，反對自從盧騷以來使教育研究陷害日深之抽象的方法論。古人的教育具有統一、充實、和自動的特色，這是一切健全的精神的發展之秘訣。法律，社會制度，公私生活的例証，以及集合的意志，凡此種種皆會集於一種單一的教育鵠的。故足以使受教育者之心靈得到準備的不是冷酷而抽象的推理與現成的觀念，而是熱烈的情操與有力的習慣。後來藉用基督教訓練的教育還算比較的有效，因為它較爲親切，較合人性，結果是較爲內在的統一，「宗教包羅一切人性於愛的法則之內，此在從前固僅限於城市範圍之內者。」因此，普通教育

預先假定普通的觀念；當普通觀念缺乏時，絕對不能達到一個集合的目標，因為這時的教育只能朝向於個人的目的。現代教育之貧瘠與乾枯由於缺乏誠信，而此又由於缺少一種清晰的、有機的人生的了解。凡此種種缺陷皆由於求助於方法的詭計之過。

卡坡尼批評盧騷及其後繼者時，常常重申其原則觀念之義，一切學說的教訓，現代的人所十分信託者，其價值遠不如一粒誠信，一個單獨的原始的觀念，因為教育不是一種機械的及虛偽的過程，而是一種心靈的溝通及情愛的神秘。他的觀點可謂澈底的現代的，因為他很清楚的了解心靈之創造的原始性以及一切教訓的方法之內在的空疏無用，然此固自認爲可以抽象地預定人格之自由生長者。他的批評特別針對着百科全書派，啓蒙時代及革命時期之教育原理之殘餘者，根據分析的練習之理性主義的教育之擁護者。其實理智的培植是教育的最終目的，但是求達這種目的之方法不是由於

將赤裸的純粹的理智——提供於哲學家之心靈的理智，只能叫兒童考察而不能自動練習的理智，總一句話

，將分析家所製造的骨骼而被兒童所視為死物者放在兒童之前。兒童的思維根本上是綜合的，因為他是直覺的。分析是分裂的；綜合是創造的。幼穉的心靈，除了創造許多其他事物之外，還要創造他自身。一個人如何能了解觀念的獲得，甚至更為神奇的觀念的安排？此乃個人在幼年時期中之所為而足與任何觀念論挑戰者。

由此可知語言起於內在的創造之自由的過程；不由於分析，而由於一種活的綜合。他全部的學說似乎是預言後來對於兒童之論理的與心理的研究之區別。他以為在當時有一種趨勢以成熟的心靈之要求讓之於兒童。成熟的心靈自然地被引至「摺合於其自身之上」，以便探究其自身而了解之，同時兒童的心靈則為感官所引導而向外拓展，以便把握周遭的世界。「我以為，這種態度對於理智之指導及形成未見得有多大的幫助。他把理智弄得荒蕪了，因為他壓抑或誤引情操與想像的勢力，而此兩種勢力在兒童期中乃正所以滋養理智者。」對於兒童之最有效力的教訓必須來自生活，而不是來自適於成人之藝術、絕對的秩序、以及一

致的方法。卡坡尼所批評為偽教育學說者是根據着一種自然性的假設之方法的詭計。

馬志尼與動作教育學 (Giuseppe Mazzini and the Pedagogy of action) ····· 馬志尼(一八〇五—一八七二)是十九世紀上半期以真正的原始的教育概念來對抗天主教教育學的精神主義之惟一思想家。他責罵十八世紀之唯物主義的、個人主義的、非宗教的哲學，雖然他對於它的深奧的歷史的理由比較他同時的人似乎還要了解些。唯物主義是一種冷酷的、令人沮喪的、個人的信仰，「一個反抗迷信的及僧侶的權勢之避難所；」但是一個人不能堅持着它而不感覺到「心靈之花」之萎謝。定命論使人繼續的「在一種永久鬥爭的苦惱中，因為他使人習慣於看作自己為事件所盲目地、殘酷地支配着」。個人主義是一種消極的學說，喜破壞而不喜改造。「他能够衝破鎖鏈」，如一七八九年在法蘭西之所為，「但它不能陶鑄合作事業與愛情之聯結」。「它推翻社會制度的基礎以及人類胸懷中之團結堅固與社會協作的根蒂」。「從靈魂中根本拔去宗教的情操即是乾涸一切生命中的永久的泉源」。「從歷史上講，我不知道人類

社會在其完成的途中，所舉辦的任何一種重要的事體不厚植其根基於強烈的宗教信仰之中者。」

否定的態度在十八世紀之發展的時期中是必要的，但是批評時代的末日已到，而有機的時代已經開始了。「若使沒有一種足以激發社會動力的原則，沒有一種有力的個體來聯結這種勢力使之調協平等，並指導他們同趨於一種單純的鵠的，」則這種時代是不會進展的。到天主教主義中去找尋這種原則是沒有用的。「人性(Humanity)已經踏進一步去了，正在探求新的標記，」因為「宗教是永久的。」這種新的標記，這種新的宗教，便是人性，它將上帝的法團放在它的靈魂中；這裡所有的是誠信、公嗣的聯結、及希望。這種概念必須改變成爲一種使命，以創造一個社會的而非個人的新時代。「它的公式將爲上帝與人性，」「普通的合作將替代個人的努力。」因此，照馬志尼的哲學，祖國的拯救乃與人性的拯救打在一塊。再造的意大利將「一躍而爲在較前更爲廣博的進步與友愛中之信仰的人性之使者。」必須喚起意大利人對於新的真理的一種意識，信仰人生是一種責任與使命，知道「我們不過是宗教思想

的化身」；惟有合乎人性的宗教纔能拯救他們。

馬志尼打算建立這種宗教爲教育的基礎，以再造意大利及人性。他從宗教中看出一種教育可以調解思想與動作。如同在上帝一樣，「沒有一種單純的思想不能改變爲動作的，」所以在人類也是如此，「在其心靈與倫理之間，觀念與其應用之間，必有永遠的和諧。」這種概念不能爲一種抽象的觀念，必須爲行爲與精神生活堅實的統一體之和合。所以要引導青年人達到這種境界，不能由於純粹的簡單的教訓與抽象的知識，必須由於動作，真正有犧牲精神的學校。喬培特，加富爾，及其餘政治家之政治的眼光不能引導意大利達到解放的地位，假如他不能找到能够運用的材料，假如這許多青年人受了馬志尼的教育之後，仍不能以殉國之精神堅確地信仰着意大利真實地存在世界上，應該統一起來，脫離外人的羈絆。沒有馬志尼所宣傳之「有效的殉國精神」，拯救意大利的偉業是永遠不會完成的。

卡薩特法令以前統一運動時期的學校(The schools of Risorgimento) to the Casati Law, November 13, 1859)

——雖在拿破侖推倒之後接着便起了一番政治的反動，

仍舊造成一種輿論，雖屬範圍十分狹小，而在教育制度範圍之內已成爲一種十分有力的酵素。在復興時期之初年，意大利的意識之內部的激動，其最爲顯著的特性之一便是教育範圍內之私人的創業，雖在毫無此種傳統的地方亦已推廣及之。從一八一四年起一般貴族及比較有知識的中等階級組織了一種堅實而增進的公民團體，發起一種猛烈的文化與教育的運動，此於新的國家意識之發展有莫大的功效。此種運動是不一致的，各地不同，因爲他不再起自中央，而起於周圍。他不再是政府或皇子的動作，而是私人之自由的創舉。全國皆默然地以刻苦的終日的工作來準備，在偉大的聯合的解放原則上已具有一種特性。雖在馬志尼及其 (Giovine Italia) 之創設 (一八三二) 與喬培特及其 *Teorica del Souverainnaturaie* (1838) 之前，已經發動了喚醒意大利意識之可嘉的工作，以爲祖國謀解放。有一種貴族階級的人已經供獻其自身於國家的拯救；他們爲共同的情愛及公同的信仰所維繫，供獻其自身於一種使命，表現於最不相同的形式中，(嬰兒學校，蘭卡斯特學校 *Lancasterian Schools*，儲蓄銀行，通俗文學，農業會社，文化及教

育評論。) 最要的，他們矢志於一種單純的鵠的——促成努力的統一，打破那分離個人與地域的自我主義，簡言之，要使「生長於一省的居民成爲一國的公民。」此種公同的情感，馬米亞尼 (*Terenzio Mamiani*) 曾在其所著 *Parere intorno alle Cose Italiane* (1839) 一書中表現之，他說，國家的解放必須從下層階級之物質的與道德的再造做起，因爲他們離開具有特殊資質的自由人民還很遠。藉着這班領袖的力量，意大利便採取一個堅決的步驟，從美術的愛好主義，從阿加地安 (*Arcadian*) 及修詞學的傳統，從古老的思想與動作之分離而至今還擾亂於我們國家的有機體之最內部的纖維之中者出發，趨向於她的拯救。

自由的團體，爲培爾及蘭卡斯特 (*Bell and Lancaster*) 的工作所感動，早經於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〇年之間開始設立互助教學的學校，雖有奧大利、耶穌會、及反動派之激烈的反對。這種學校傳播得很廣，如 *Charles Albert*，*Carignano* 王子，及 *Freme* 侯爵之在皮底蒙 (*Piedmont*)；*Confaloneri*，*Arrivabene*，*Ugon*，*Mompian*，等之在倫巴底 (*Lombardy*)；*Cosimo Ridoi*，*Serristori*，*Furtoni*，*Capp-*

oni, Mayer 之在塔斯干尼，雖在鄉村區域，亦有得自由僧侶之扶助而設立者。在佛羅稜斯 (Florence) 的模範學校直到一八四八年都進行順利，其在別處的學校，則在一八二一年革命變遷之後，全被壓抑，僅於後來各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再行興起。

在第一批蘭卡斯特學校設立了不久之後，嬰兒學校 (asili infantili) 也設立起來，完全為對於現代國家中人民的使命之高尙的了解所感動。牧師愛巴地 (Ferrante Aponte, 1791—1858) 於一八二九年開設模範學校於格里摩拿 (Cremora)，不久便變為全國各地所仿行。藉着 Accademia de' Vergotti 的力量，在佛羅稜斯組織了一個建立嬰兒學校的聯合會。促進這種學校及會社到處推廣，同時關於嬰兒教育的文字亦發表了很多。和蘭卡斯特學校一樣，嬰兒學校也大為耶穌會派、反動派所攻擊，為政府所壓制；甚至大詩人雷奧怕第 (Giacomo Leopardi) 之父 Monaldo Leopardi 在其所著未署名的小冊子 *Le Istituzioni della Pubblica Carità* (Lugano, 1837) 中稱之為撒但 (Satan) 的施計所提議的「一種謀略，又一種騙局，或者是一切中

之最壞者。」

愛巴地的嬰兒學校和福祿培爾 (Froebel) 的幼稚園，其中沒有什麼公同的地方。前者在初設立時是一種慈善機關以表示社會之遠見者，從乃為自由派所採用，以為提高貧苦階級之一種有效的工具。愛巴第想把天主教傳統中之宗教的成見和羅馬格諾西 (Romagnosi) 介紹給他的裴斯脫齊派的方法混合起來，結果便產生了祈禱及許多「客觀的」練習，使得這種學校印上虛偽的及機械的性質。此種學校的重要倒在於後來它成為政爭的樞紐之一。培第 (Domènico Perini) 後來說，「學校的設立是一種政治的事件，是一種愛國的舉動，是對於反動派的一種抗議。」

雖在那不列斯，特別是一八二一年之後，私立小學亦遍地皆是，其所採用的方法種類至多。這種學校的兒童幾全來自中等階級。惟在各省及西西利島之小學教育，則直至附屬於皮唐蒙之後，始從幾世紀來之沉寂狀態中復現出來。

私人的創辦在中等及高等教育中則較受限制，政府乃灌注其全力於此。惟那不列斯王國則為例外；在其首都中

，私立學校之多爲他處所不及，常引此爲光榮之事。自一八二一年至一八四八年之間，在浦奧特(Basio Pueri)，得桑特士(Francesco De Sanctis)，可怕文達(Bertrando Savaria)等著名大師指導之下，設立了很多文學和哲學的研究機關。

因爲相信民衆及國家之經濟狀況的改進與政治的拯救都和普及教育之推廣有密切的關聯，所以許多爲婦女和兒童而設的教育機關與改進技術、農業、及工業訓練的學校皆大爲興起。一八二七年，Gorna e agrario toscano 創設於佛羅稜斯，藉助於(G. P. Viussieux)之努力及李多爾非(Losimo Rodolf)，朗勃魯希尼，利西(Lipo de Rice)諸氏之指導者頗多。一八三五年，李多爾非創設一間模範農業學校，以田間之工作爲「一種道德的體育，有用的和積極的觀察之始基，堅實的和本基本的教育之機會，善良的和節儉的習慣之基礎，宗教的感悟之刺激。」朗勃魯希尼，於促進各式學校之外，專爲一般工匠組織一間星期學校(holiday school)并印行極好的教育書籍爲他們之用。利加梭里(Rettino Rasoli)是意大利最偉大的政治學者之一，又是

繼加富爾之後爲政府顧問會之主席的一個人。眼見着他自己所管地方布羅利奧(Prolio)農民之教育，大爲感動，好像當他們是他自己的兒女，乃認定他的使命爲給予塔斯干農業以「一副心腸與一只頭腦」。

同樣的認識下層階級的教育爲國家的自衛也即是指導階級的自衛之首要的責任，因此 the Associazione Agraria of Tinn 便於一八四二年創設起來，不久便成爲教育活動的中心，皮底蒙之最爲銳利的勢力皆集中於此，而且教育動作中之最有力量、最爲勇敢的衝動皆從此發動。他設立成人夜學及星期學校，藝術學校及職工學校，與農業講座；他極其審慎的運用所有的工具去推廣一種廣大的經濟訓練，此在後來擾攘的時期中居然成爲社會凝合之最大勢力之一。他極力扶助開通的慈善事業，衛生保障，及教育先見的種種活動，并且鼓勵教育總長梭士鉄諾(Alfieri di Soanenno)氏之廣博的教育革新，而予以助力。有幾個會員，甚至有幾位最爲特出的會員，私人去組織并指導應用科學的自由學程。這種組織是有深思遠慮的、便利於貧苦階級的、社會立法之最初擁護者的養成所。



最後要提到私人事業中之效果最爲顯著的便是喬培特，培第，雷納里(Reyneri)，培第尼(Bertini)等。于一八四九年在杜林(Turin)地方所創設的 *Societa di Istruzione di Educazione*。它的年會，它的各省委員會，特別是它的 *Giornale*，對於皮底蒙之勇敢的改革俱有絕大的貢獻，卒之達到卡薩特法令之通過。

當一八四四年愛巴第爲杜林師範學校之指導時，皮底蒙的政府開始對改革運動讓步，在表面上常常反對反動派及耶穌會派。兩年後，梭士鉄諾侯爵(Marquis Cesare Alfieri di Sostegno)被任爲教育改革專員，此爲反對奧大利的挑戰案。一八四七年廢除改革專員制(Magistrato della Riforma)，代之以 *Regia Segreteria di Stato per l'Istruzione Pubblica*。從一四四八年到一八五九年之間，教育上的自由革新層見叠出，使皮底蒙在教育上站在第一個位置。一八四八年的法令，用教育總長逢康柏尼(Carlo Boncompagni)之名以名之者，可以認爲一種基礎石，後來意大利普及教育的結構完全建築其上。它的目的在於「用教育和自由來再造意大利國民」，是皮底蒙一般大思想家經過長時間

熟思考慮的結果。這條法令，於廢除宗教團體在教育上的一切特權及教會的權威對於國家學校之一切干涉以外，還改組小學、文科中學和大學。他建設一個健全的行政及輔導的系統，予大學以新生命，區分中等教育爲文科及工業科兩種。他又把專門準備升進中學的小學教育和自身有特殊目的之普及教育分別清楚。寄宿學校使用耶穌會的房屋及其收入來設立。在杜林，熱那亞(Genova)，及尼查(Nizza)三個地方開設試驗專門學校(Experimental Colleges)，給一般不願學習文科的學生以相當的功課，——這是現在工業課程之起點。

逢康柏尼的工作繼續進行，毋稍間斷，到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卡薩特法令可謂登峯造極。據報告，此法令之目的欲使教育指導趨於統一，適宜地應用自由的原則，而且照顧公共教育機關，使能在這種自由的鼓舞之下，得到一種新生命，以達到 Victor Emanuel 光榮時代的命運所允許的隆盛地位。此法令後乃稍事修改，漸漸推及於後來所歸併的各省。

卡薩特法令可以追蹤一九二二——二三年間香第爾改

(Cenfile Reform) 以前統治教育的基本法則。此法令使一切公立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堅決地、完全地還俗化了。宗教的教授，因為政治上的理由，尚保存在小學及（到一八七三年）大學的神學院，所有僧侶勢力的踪跡皆驅出於學校門牆之外。新制度的組織根據於自由的原則，但是立法者認為確定此種自由在各級教育上的限度及其應用的方法是他的使命，因為自由可以變易為種種不同的方式與等級是無疑的。當時有二種教育的組織足資模範者：——英國的制度，完全不受政府的干涉；比利時的制度，公私立學校之間互相競爭；德國的制度，無論公私立學校俱受政府的管轄。卡薩特法令繼續從前的精神，授予教育以自由，惟特別留心以防護之，使在其正當的限度之內活動，又使保證人維護之，使毋受敵人之明顯的及秘密的襲擊，而逸出其固有的軌道，損傷其效果。得到最廣大之自由者厥為父母的權威；私立學校須能證明其能力及善良的校風；慈善機關亦得到充足的活動範圍，以善用其工具及創始的能力，惟須受授予及維持其政治的生存之權威的監督與指導。

小學教育變為國家的一種功能，是強迫的，在自治區域內且使之免費入學。小學校不再為一種預備學校，注其全力以教授一種基本的普通知識，使其自身成爲一種完滿的整個。爲造就小學師資起見，設立三年的男女師範學校各九間；歸併來的各省陸續增加其餘各種學校。中等教育亦大加推廣；工業的教學與文科課程佔同等的地位，現代哲學和科學的教學即於此時引入於文科課程之中。高等教育的使命，在於準備青年從事於公私各種事業，及「維持與增進國內各部之科學的及文學的文化。」設立五個學院：神道學；法學；醫學；數學及自然科學；哲學及文學。在現定的課程之外，大學教授可以自由講授其所最擅長而且已有事實足以證明其學力之任何部門的知識。學生准許選擇其自己的功課。

自由的制度乃有一種中央權力及教育階級之堅實的組織與之抗衡。最高的權力授予教育總長及高等會議之手，另設三個視察員以助其分別管理三級教育。各省的中等及工業教育受一位王家視察員之管轄，每位尚有省教育評議會及地方視察員輔助之。大學的行政付託於校長一人，大學校長即在全體教授中互選之，每年一次，各學院有輪流被選之權。

# 中國教育應否仍重知識

胡毅

個人教育成就之有無，不在修學年限，畢業名次，及

入世後之地位，聲名薪俸，而在其有無對付問題之態度及方法。國家教育之成敗，不在學校數目，學生成績，校舍大小，經費總額，而在其國民應付危機之態度及方法。一個有適當態度及合宜方法去對付問題的人，不必去查問他的貴族，貴族，收入幾何。否則十載寒窗，高官厚祿，仍是無成，一個國家，若是國民對危難有清醒的態度，及有效的方法；即不必去查國內的教育各種統計。否則學校林立，學士成群，仍是失敗。

目前中國適臨大難。我們正可從國人對付這危難的態度及方法上，去審查中國人教育的程度及中國國家教育之成敗。

中國的當局，不是未受教育的人，有多少還是新式及外洋學校出身。表面上，何嘗不是「學成有用，光親耀戚」。但是危機已發，態度是「不抵抗」，「鎮靜」，方法是「避免衝突，聽命國聯」。這種態度方法，是否已應付危難，

是否能應付危難？

中國的學生，是正在受教育的人。表面上，又何嘗不是「含英咀華，儲才備用」。危難發生以後，態度是憤激，慷慨，方法是罷課，請願，組織義勇軍。這種態度方法或許是在現有環境之下頂充分的表示，但是否已應付危難？是否能應付危難？

中國的民衆中間，至少有一部分是受了教育的人。表面上，何嘗不居領袖地位，各盡厥職。但是對付危難的態度，多半是「不管」，「旁觀」。方法是「各行其是」，「議論他人」。這種態度方法，又是否能應付危難？

因為中國有危難當前，而國人所有的方法態度都不足應付這危難；所以從前及現在的教育，都可說是失敗；所有受了教育的中國人，都可說是無成。

或問「這種危難是意外的事情；教育是準備日常生活的，怎樣好專門教人對付危難？」這種人未免把教育看得太窄，及把國家的危機看得太簡單，以為教育只是教人在

太平天下作良民，而外侮未臨頭是不值得注意。殊不知真有效的教育，不在教人能適應太平天下，而是教人能處亂世；真有效的救國，不在出事後的宣傳，而在出事前的準備。所以，使人民有應付危難的態度及方法，是教育的責任；國民及當局缺乏這項態度及方法，即是教育之失敗。

過去及現在的教育，爲什麼不能使我們及我們的當局有臨危的態度和解難的方法呢？因爲大家都被「知識」所迷，把他看成教育的全體或主體，很少顧到態度和方法。「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去培養訓練，態度和方法，又從那裏會出來。注重知識的教育，最多能使人有多量現成知識；至於怎樣去求得那知識，和什麼時候應當怎樣用那知識，却都不管。過去及現在的中國，即是中了這種教育的毒。

在專重知識的教育制度之下，教者學者都全神貫注在材料，年限，學分，畢業，以致無暇去理方法，和態度。所以學商科的只求牟利，却不管從那裏得利及得了作什麼。學軍事的只求能打仗，却不管對誰打，爲什麼打。中國的財政當局對於公債賦稅的知識並不缺乏，中國的軍事當

局對於布防作戰的知識也不缺乏，但是結果是當用的錢不用，不當用的花了成千累萬；應打的仗不打，不應打的打得落花流水。這種盲目的知識，愈多愈糟。目前中國大難之主因，並不是因爲缺乏知識，而是因爲有了知識不曉得應該怎樣用。只須客一分析國內災禍之釀成，便能看出有多少是無知愚民負責，又有多少是受了教育的領袖負責。沒有知識，固是可憐；有了知識而用了去禍國殃民，更是可怕。

盲目的知識雖是較沒有知識還危險，但是也無法將他取消。教人放槍是不容易，但是要使槍手變成不會放槍的更難。明白怎樣去操縱公債是很麻煩的事，但是要使善操縱者變成不知道操縱的却作不到。即是作得到，也不必去因噎廢食。中國之糟又何嘗是軍事財政知識本身之過？中國的將來又何嘗不需知識？只不過是要怎樣設法使知識歸入正道，才可使危險變成坦途。邪正善惡，從知識本身是無從表出。打手槍的本領，可以用來殺敵，也可用來綁票；那一個用途是正當，你手槍打的再準也無從分辨，你對打手槍的態度才是關鍵。

對事物的知識，可決定行爲的精確程度；有了態度才能決定行爲的方向。知識只能教人打槍，態度却能指導他什麼時候要打什麼人。中國現在及過去的教育，都是造成一班人，會打槍但是不知應打誰，會發財但不知應從那裏發財，會建築但是不知應先建築什麼東西，會革命但是不知應先革誰的命；所以結果是亂打，亂發財，亂建築，亂革命；於是就有了內爭，貪污，私宅，糾紛。叫他們莫打，莫發財，是作不到也不必去作。將來中國還是需要打，需要發財；只是要在態度上作一番功夫，使能打能發財的人，在應打的時候打應打的人，在應發財的地方去發財來作應有的用途。使知識有了態度的指導，就好比馬上了籠頭，火車入了軌道，不會闖禍了。

專重知識的教育，還有一個缺點，即是注重結果而不管結果是怎樣得來。當然，生在文化進步的社會中，是可以享受種種結果，而無須知道來歷的。坐汽車不知道汽車的道理，看電影的不懂得電影的原則，並沒有什麼坐不穩，看不見的事。但是教育的任務並不是只教人去用現成的東西，及明白已有的方法，而是在教他作新東西，及想新

辦法。換句話說，教育不僅是指出已有的道路，還要訓練開路的本領。所以要借鏡他人得結果的方法，去訓練自己去求結果。坐享他人成績，雖是不勞而獲非常舒服，但也有罪惡與危險。唱高調的可說人群要互助，專佔他人的便宜不對。即是不管這層，只要一想，多佔人一分便宜即是多倚靠他人一分，危險就不言可喻。例如長江一帶，國人可以來往坐外國輪船，彷彿是有人當差，不必自己修路釘船；但是一旦洋船不載華人，除掉能坐飛機的人外，從上海到漢口恐怕還是同一百年前一個樣子。

中國新教育的開始，目的即在到外國去學他們已有的結果；有的是學了造船修路，有的只學會買船買車，造船修路的也還是買人家的鋼板鋼軌。新教育愈發達，輸入的現成結果種類愈多，從兩翼能飛的飛機到無翼而飛的主義，莫不是整個兒拿來照用。近來才漸漸知道整個兒照用有時用不通，於是有了「適合國情」的論調，要把外來的東西加上中國字的招牌仿單。但那仍是外國鈔票公司印的中國鈔票，完全是洋貨。因為那東西原非中國貨，所以要使他適合國情，這四字聽見之多，即是因為國中收來別處現成結

果過多之故。目前的教育，雖是力求適合國情，但是骨子裏仍是作轉運工作，只不過是門面上有漢文招牌而已。如果販的不是現成洋貨，又何必求他「適合國情」呢？

這種轉運現成結果的教育，無在不養成一班人倚賴的劣性。「聽命國聯」，「仰仗列強」，都是這特性在行為上的表現。因為從來自己沒有想過辦法，這回當然可以不想；從來是相信洋人，這回當然要信。這個劣性，不是生來的，而是教育養成的。

因為教育只是灌輸現成的知識，所以一切對世間萬事的態度，及對付新情境的方法，就只好靠各人運氣好及自己努力。現在那些少數人之有態度有方法，都是運氣好及自己的功勞，所受的教育可說是毫無貢獻。在這種關鍵地方未着力，是中國過去及現在教育失敗之病源。

目前的中國，最需要的是臨危的態度和解難的方法。將來的中國，更需要臨危的態度和解難的方法。既有這需要，我們便可直捷了當對症下藥，不必走大圈子。已往和現在的教育既因專重知識而失敗，而目前及將來之需要又是在方法和態度兩方面，所以我們就主張推翻現在注

重現成知識的教育，去建設注重態度和方法的教育。我們的目標不是灌入若干現成的知識，而是在造成對世間事物有合理的態度，和自己能想方法的人。

### (二)

主張教育中要注重態度和方法，並不是說完全排除知識。前面已說過知識本身無過失，只是將其過於注重才引起教育之失敗。說教育非全是知識，並不是說教育不要知識，只不過是說除知識之外還有別的東西，而這別的東西還較知識重要而已。這個別的東西，便是態度和方法。

一個真受了教育的人，不必隨身攜帶畢業文憑和同學會證，從他「待人接物」上即可看得出來。所謂「待人接物」，即是對人對事物的態度。他不但是認得一個人。曉得一件事，他對這人這事都有一個見解，一個態度。他不僅是有知識，而是有評判及價值的估計。在他的朋友中，他可分出那些是「可共患難」，那這是只能「敬而遠之」，那些是只能「虛與委蛇」。他不但知道存款放入外國銀行較穩當，以及明白那是足以促成本國金融界的恐慌，還能權衡出其中孰輕孰重。

培養態度，即是使每人對自己及他人的行為及一切事實，都有一個態度。使人有態度，決不是叫人取同我一樣的態度。知識可以灌輸，態度是不能灌輸的。我們可以叫兒童明白我們明白的道理，但是不好叫兒童厭惡我們厭惡的人，或是叫他們一定要喜歡我們喜歡的東西。我們希望學生所有的態度，是他自己的態度，而不是預先經教育部或任何機關審定的態度。自己的態度，一定要經過自己思索評判才能得到。教師只能教他思索教他評判，不能替他思索替他評判。歷史上多少專制的君主，黑暗的教會，都是想替人民思想和評判。結果如何，昭如日月。

所以注重態度的教育，沒有注重知識的教育那樣簡單。又要養成態度，又不能硬裝進去。硬裝的結果，便是造成恰恰相反的態度。多少教會學校出身的人反對宗教，學校愈禁吸煙，學生愈偷吸得起勁。教育的工作，與其說是培養態度，不如說是訓練決定態度的能力。因為所作的事，不是告訴學生那些事當作，那些事不當作；而是使他自己分辨清楚，自己能決定一個態度。

這種辦法，與那些宣道式的道德教育，截然不同。那些教育，是用各種方式告訴學生那些事當作那些不當作。

結果是學生能把當作或不當作的事列成一表，或是當面不作你認為不當的行為。這些道德知識及表演式的行為，實際上都是一文不值。世上的老奸巨滑，誰不會空談道德，假裝正經。講愛國的，可以賣國。多少傳教的牧師，可作傷風敗俗的事。真正的道德行為，完全是靠自己的道德判斷力。道德知識，不能包羅萬象；道德制裁，不能隨時隨地存在；只有這個判斷能力，一旦養成，是不會失掉的。決定態度的能力，即是這個道德判斷力。

中國已往及現在的教育是因未訓練這個能力以致失敗，以後的教育就應從訓練這個能力着手。

注重方法的教育，不是專敘現成的結果，而是研究得到結果之方法；使學生一面能照樣得同樣結果，一面能創其他方法去得不同的結果。例如訓練醫藥人材，就不但要教他怎樣用「亞司比林」，還要使他知道怎樣作出「亞司比林」，以及用別樣原料製出功效相同的藥，研究科學的人，就不只要知道最新的理論和發現，還要知道理論的由來和發現的經過，才有創新理論和得新發現的希望。

這種教育，又比灌輸知識為難辦。方法的訓練也是不

能注入，必須要學生自作思想，計算，推理，實驗的工夫。照人家方法時，非有這幾項訓練不行。想自出心裁，更非有此作基本不可。

讀者切勿因上述例子，而以爲方法訓練是限於科學或是高深科學。其實最切身有實用的，還不是科學裏面的方法！通常要解決的問題，也並不是理論和發現的問題。問題可深可淺，需要的思想，計算，實驗，等也可繁可簡。只要不是叫學生檢現成結果，而是令他去探求來由，或去自想方法，即是方法上的訓練。

我們所要推翻的是專重知識的教育，要提倡的是注重態度和方法的教育。目標不是使每人儘量裝最多的知識，而是使每人都有自決態度與自想辦法的能力。工作不是灌輸注入，而是訓練學生去思想，評判，推理，及嘗試。不希望將來有成于累萬的知識罐頭，而希望將來多有幾個能應付危難的人。

### (三)

中國現在教育之失敗，是因爲專重知識；挽救的辦法不是增加知識或變更知識的性質可以爲力，非把注重轉到

態度與方法兩方面不可。給一個人許多很好的知識，但不教他自決態度和自想方法，不僅是害了那一個人自己，而且害了他所存在的社會

中國近三十年來，「教育救國」四字，幾乎成了老生常談。三十年前的小學中學生，常聽教員說中國將來是靠他們。現在還是這句老話，還要等現在的中小學生負責。

五四運動「時代的學生，何嘗不是當時認爲將來有望。現在那班學生都已入世作事，希望又到那裏去了？照這樣辦教育，莫講「十年教訓」，便是百年教訓也難收效。因爲三十年來所作都是專重注入知識；其不能表現效果，並不是因知識太少，或是某種知識缺乏，而是因爲在知識以外沒有看見別的東西。若我們仍舊執迷不悟，依然想在知識裏面找出路，當然是此路不通。若仍把教育當成純是知識的注入，教育當然不配救國，不能救國

因爲教育專重知識，而養成的人材不見得出色，不能挽救中國，於是引起教育界人的灰心和敷衍，以及外界人對教育的懷疑。以爲「教育救國」，或許全是自欺欺人。這樣對目前教育灰心或懷疑的人，都是有心人；而引起他



們灰心或懷疑的事實，確實是令人齒冷。學校中的優秀學生，一個個成了優秀官僚，投機分子。常年打賣國賊的人，今日接他們的衣鉢。救國募捐，中飽私肥；集會組織，寅緣官府。多少教育界的領袖，成了政客鉅公的嘍囉。如何不使人灰心，懷疑？

但是這種事實，是否教育的必然結果？當然不是。不過在專重知識的教育理論及其附帶制度之下，是難免繼續發生。所以我們不必對整個教育灰心及懷疑，只須對這個負責的理論及其附帶的制度算總帳。「教育救國」，不見得是沒有希望，只是要看教育是怎樣辦。

使中國教育失敗的理論，是把教育看成純是一種現成知識的傳授。因為只注重知識，所以教育制度都是用年限，學分，科目作單位；教育內容，完全是可記可背誦的事實和原則；教育方法完全是注入。要想使教育前途有望，這幾方面都應有澈底的改革。

第一，教育目標就不要再專重知識，而要以培養態度和訓練方法為主。（此點已申述甚詳，不重述。）

第二，現有制度中的年級，科目，學分等辦法應根本

取消或大加取締。用時間來作知識標準，指定某人若干鐘點要學若干東西，已是笑話，既然教育的主體不在知識，那麼這些為知識而設的制度就更無存在的必要。如果科目仍要保留，至少應大加減少。如果年級的名務仍要用，至少不要再用了來表示教育程度。

第三，上課的教育方式，應減到最少。專靠上課來傳授知識，都不一定能得結果；何況態度及方法方面的教育更是全要學生自動學習的。關於態度和方法的教學法，現在還需研究實驗；但是決非注入一類，是可斷言的。養成判斷思想能力，少不了要練習，要自己去作；也斷不是呆記死裝能得結果。所以上課時間要減少，好給時間讓學生去作，去想。保留下來的上課缺點，也是要注重教學生作，教學生想，或是討論他們作出想出的結果。純粹的灌輸，不逐出門外，也只能站在門口。

第四，教育的考成，應以實際結果為主，取消以考試知識為審查辦法。我們的目標若是教學生游泳，考成的時候，就只要看他不能游，不必去管他是否記得關於游泳的知識。如果我們是教學生思想判斷，我們就應直接去看他

能否思想判斷，不必去管他是否記得關於思想的原則。背誦了游泳指南的人不一定能游泳，熟悉大小前題各種原則的人不一定能思想，滿口仁義道德的人可以作姦犯科，都是一個道理。

所以查考教育結果的時候，要去看某生是否能隨時隨地自己決定態度，自己想方法，而不是去看某生在某一時某一地能記得或抄得若干事實。這種工作，彷彿是難。其實較出題監考，閱卷計分。要容易。在現在專重知識的教育制度之下，我們還常能從日常言談舉止行為工作之中，看出某一個教師是能自決態度，某一個學生是能自己想方法。若是大家對那方面注意，必有更佳的結果。

現在之把教育分成大學，中學，小學。完全是根據知識之多少深淺。直到了有困難，有問題的時候，能決態度能想辦法的人，大學生未必多於非大學生，中學生未必多於小學生。年限方面的階級，完全不能代表教育上的程度。不把對年限，畢業，學位的迷信打破，教育就難免仍以知識為主體。

打破對學位或畢業的迷信，並不是說一定的取消學

位或畢業制度。反對以考試知識為教育考成的方法，並不是說不能用考試去選專門人才任事。本文目的，只在破除對專重現成知識觀念，而主張今後教育應在態度及方法上着力。庶幾教育本身上可省許多消耗，社會中可少許多罪惡，國內可減許多混亂。二三十年後，或可多有幾個能自決態度而敢發表，自想辦法而能實行的人。那時「教育救國」或許就不致仍是空談了。

### 民衆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一號要目二十年十二月出版

杭州新路浙江省立民衆教育實驗學校出版

- 民衆危機與民衆教育……………李石岑
- 民衆教育與職業教育……………劉湛恩
- 民衆職業指導……………何清鑑
- 民衆文化教育……………許本震
- 美國成人教育之研究……………鄭一華
- 成人教育徵學制……………黃敬思
- 公民教育之實施……………徐芳田
- 民衆學校教師生活漫錄……………馬祖武
- 我國古代民衆的醫藥知識……………鍾敬文

二十年十二月出版 定價 全年一元每期三角

# 目前中學教育之使命

唐現之

(一)我國社會現象——教育乃社會各種作用之一相，要談目前的中學教育自然非觀察社會的狀況不可，否則便是無的放矢。

現在我們急於要問的，便是我們社會現狀究竟是一種什麼現象。要詳細說當然不容易，可是我們可以用窮亂兩個字把他總括起來。這兩種現象是循環的，便是說愈窮愈亂；愈亂愈窮可是這是現象，不是原因。

其原因在世界已變人心未變 何以見得世界已變，人心未變？所謂世界已變，是指歐洲影響全世界的產業革命使世界大變了，地球縮小了，侵略的捲取的方法和能力增加了，幾乎整個世界無一處可以幸免。中國是世界上毫無遮欄的一隅，決無不受侵略的道理，這是年來大家所常談的「帝國主義的侵略。」

其次要說的，便是「人心未變」。我這裏所謂心，不是指什麼良心的心，是指我國社會上深入人心的幾乎牢不可拔的種種習俗，或觀念，或思想；這種種習俗，或觀念或

思想中之最顯著的，便是升官發財的思想。

升官發財的思想由來已經有幾千年了；一部四書是中國人的聖經，無論讀與不讀，都受他的思想的薰陶。所謂「學而優則仕」。所謂「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又國朝國策中所載的文人奔走巴結以至升官發財的種種事實，影響後代的人心亦不小，最動人的便是蘇秦由一個窮小子，面受六國君主的封賜。無怪乎社會上一般人士之前備後恭了。即是號稱萬世師表的孔孟也不外是兩個政客。想找一個於世思想上有巨大影響的人，而始終貧賤反抗社會的，如耶穌與蘇革拉底之流簡直沒有。

到了近代且有無恥的文人，編出通俗的書籍以為傳播，如「天子重賢豪，文章敕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又「白馬紫金鞍，騎出萬人看，花街紅粉女，爭看綠衣郎，借問誰家子，讀書人做官，」看來雖然覺得肉麻，可是確是實情。在君主時代，天天當然是最高無上的權

威者，誰不想巴結他，同時他也想培養一班替他保江山的奴才，所以多方引誘，多方籠絡。食色是人之天性，虛榮心在青年時代特別興旺，所以用「紅粉女」和「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來引誘他們。近代的教育，一則曰引動機，再則曰激發興趣，想盡了方法，無論如何，不及用美人計作起點，以升官發財為最後目的那樣有效。

以上是說升官發財的思想之深入人心的歷史的和心理的原因。

以下我將說說社會的原因，蘇秦第一次出去找官做，不得要領，寒酸地走了回來，為隣里家人所不齒；第二次做了官回來，便都起而歡迎了。劉邦做了皇帝，便要歸故鄉，以誇顯要，這便是所謂「揚名聲」「顯父母」，光宗耀祖的勾當。再加之全家全族的人都在那兒威迫利誘「倘使他沒有旅費，親族必定要為他湊個會，或是借錢給他去應試。倘使他不，又必要用「不長進」一類的話羞辱他。使他覺得不去應試是可恥的」（陶知行語）這又是一種心理上快與不快的原則的利用。可是家族為何要如此？這不外乎中國的社會是一種宗法社會，賞罰都與九族有關。楊太真以

顏色得君主之寵，姐妹兄弟皆列王侯，何況以文章出仕的女人！

升官發財的思想，既然是如此養成的，有歷史的，心理的，社會的種種原因，自然根深蒂固，不易拔了。

並且做中國的官有幾個特別權利

濫用權威——中國始終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即有法律也不用之於官吏，反為官吏用以榨取人民的藉口。最明顯的說明，莫如俗語所說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放火是有害無益的事。而官吏為之不為犯法，點燈是人人必需的有益無損的事，百姓為之，反而不許。這種習慣久已深入人心。因法是不上大夫的。既然如此，便可以為所欲為，可以取分外之財，可以殺人越貨，可以掠奪美色，可以盡情放蕩。

不勞而獲——他既可濫用權威，便可驅人供他使用，加之社會上一般人，受威迫利誘慣了。不特不以趨炎赴勢為恥，且以趨炎赴勢為榮；再加之中國人做事不講效率，可以五日一筆，十日一字。似乎曾有人統計過前北京某部的人員平均每人每天所寫的字若與其薪水比較，約當每元

一字。中國所謂辦公事，只是辦公文；辦公文而不寫字。其不勞可知而知了。然而他們所獲並不算少，不特不少，且有非分的錢財。

萬人爭羨——既不守法又不做事，而且有分外之財可得，天下沒有再比此更便宜的事。如此便宜的事，誰個不想，誰人不羨。因為人人羨慕，所以為一種榮耀的事，也便是一種爭奪的事了。

除上列的三個原因，——歷史的，心理的，社會的，——之外，又有實際的利益可得，無怪乎升官發財的思想至今更烈。

所謂至今並不是一句無憑無據的話陶知行先生說「小學堂畢業給秀才，中學堂畢業給貢生，高等學堂畢業給舉人，大學堂畢業生給進士，外國留學回來的赴朝考及第給翰林點狀元。社會就稱他們為洋秀才，洋貢生，洋舉人，洋進士，洋翰林，洋狀元。後來廢除功名，改稱學士，碩士，博士，等名目，社會莫名其妙。得到這些頭銜的人，還是仍舊用舊功名翻譯新功名，說是學士等於秀才碩士等於舉人，博士等於翰林，第一名的博士便是從前的狀元，

說的人得意，聽的人由羨慕而稱道不止」。

據最近教育部的全國教育統計。大學生中所選擇的科目，以法律為最多，文科居次，商科居第三，由此大可以看出升官發財思想之熱烈，就目前社會的狀況看，選這三科的人固然是有升官發財的思想，即學科學的人，也不無這種思想，試看大學畢業生，不論在那一科畢業的，都不惜奔走權門以求一售。

有了這種不當的思想，才產生統治階級的壓榨。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至使手工業破產，商埠勃興。一向以農業而兼手工業的人（包括其家庭中人而言），多趨居都市。鄉間生產事業，無人顧幹。再加統治階級的壓榨，人民更不聊生，他們有了特權尚不自滿足，又養兵以為其保護既得的權利，及爭奪未得的權利，既有士卒，以為爪牙，則武人橫行，凌假為一切統治階級的指揮者，而一般文人又為武人的馬首是瞻，願做他們的奴僕。武人頭惱本極簡單。不能不利用文人。而文人則各忠其主（其實也是為其本身利益），巧立名目，互相討伐。於是內戰頻仍，幾無寧歲，戰敗者其部下成為流寇，成為土匪，以擾人民以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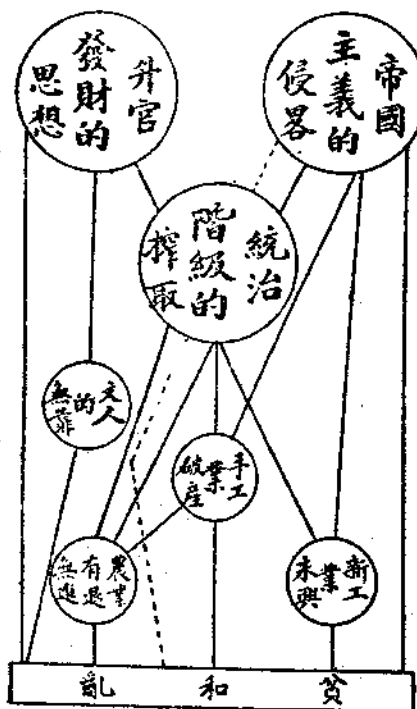
產者。使人民無安居樂業之可能。勝者又乘其戰勝餘威，大刮民財，大增隊伍，人民無論其統治者戰敗或戰勝，除多增担負，多添擾攘外無他報酬。

有人以為內戰之起，起於有兵，苟人民大家相約不常兵，則亂可止。他却不知道自帝國主義發達以來，其侵略之風銳不可當。中國是一個空虛的國家，其侵略之風，為何不入？這的確是自然之理，無可更移的。有了他們的侵略，手工業自然破產。手工業之破產，尙不是致命傷。最可恨的，便是一般人只知由做官去發私人的財，不知用政府之力去發公家的財，由做官去發私人之財是大家都想榨取他人現成之財，不肯自費心力去謀生產的發達。在今日的中國謀生產的發達，當然不容易因較大的資本，則敵不過外資的競爭。要有較大的資本，非政府與以獎勵和保護不可。那知中國一向的統治者，不特不與以獎勵，與保護，反而摧殘之。最顯著的如招商局及國營的鐵道，這樣自己的新產業何由發達。自己的新產業既不發達而舊產業又日趨破產，於是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取之者貪。人民焉得不窮。窮了焉得不亂，他們唯一的出路便是當兵，戰敗

便當匪。他們真甘心為兵為匪嗎？必不得已也。武人縱不招他們，他們也將為匪。

至於一般文人——新舊的讀書人——產出既多，升官發財的思想又牢不可拔，而統治階級的位置有限，便成了粥少僧多的現象。有位置的有靠背山的人固然助桀為虐，沒有位置的，——無靠的因其做官心切，及為生活所迫，便到處掀波，唯恐天下不亂。天下亂，他們才有趁火打劫的機會。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中國的社會現象何以一至如此，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的，一個是世界已變，即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個是人心未變，即升官發財的思想深入人心。這兩原因生出其他無數的小原因，結果是貧和亂。現在因篇幅所限，不能詳說。詳畫一圖表明之。



(二)目前中學教育之使命——上面我們已經講了中國的現狀是窮與亂，其原因是世界已變而人心未變，未變的人心，不能適合已變的世界，且足以造亂製窮，年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甚囂塵上，結果帝國主義又絲毫未見動搖。其原因固然很多，而人心未能改造是原因之一。即使帝國主義被其他民族打倒，中國再無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是人心未能改造，則始終不能逃出窮和亂的旋渦。我這樣的說法，有人或以為是二元論，或以為是唯心論。現在我且不同他們爭辯。因為篇幅有限，不能多說。他日常再為文詳細討論。如果讀者，喜歡新名詞，大可把「升官發財的思想」改為封建思想，或某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數千年專制政治及宗法社會造成的。目前專制政治的形式總算推翻了，宗法社會已在崩潰了，可是由牠造成的意識形態，却仍然根深蒂固地生長在人的行為（包括思想習慣）中，所以我叫牠「人心未變」。

要便「人心改變」，決不是武力所能成功，也不是口號所能奏效。全在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是在以環境改造經驗，（或稱行為，或稱習慣，或稱思想……）。目前的教

育之所以無效，是想用書本及口號去改造經驗。這無論如何，敵不過社會上數千年來的惡習。所以要改造人心，當使整個教育系統都向着這方面進行，不過大學的人數有限，且其習染已深，因為他們多係富貴人家的子弟，在家庭中已於無形之間染有升官發財之念，在學校中朋輩之間又以此相當。畢業後與統治階級及候補統治階級的來往機會復多。他們有這樣的習尚與環境想要他們打破做官發財的思想真難乎其難。

其次我們且看看小學，小學生人數固多，習慣未深，理應培養一種做人的正常態度，以與舊社會的惡習慣爭鬥。可是他們的年齡尚幼，見解不足，思想感情，亦易改動。即不為社會所同化，亦易為舊勢力所屈服。

大學學生習慣已成，小學學生見解不足，（就大體而言，並非人人如此，）都不容易打破升官發財的思想的重任。能負此重任的恐怕非中學學生不行了。中學生入世未深，惡習較少，即有亦容易改變，以其沾染尚淺的原故。在另一方面，他比較有見解，有思想，能辨別是非黑白。以大義曉之，以理由說之，必能領會。並且他服務公衆

，處理事務的能力；如果能够善爲引導，必定能够獨當一面，惟理是從，「見義勇爲」，「當仁不讓」，雖有大力，亦莫如之何。凡此等美德，在中學校中，大可養成。並非奢望，不過要看我們養成的方法如何，現在且不必多說，以後尙有所論及。

中學生既有如此的可能性，可以養成上述的美德，他便可作社會的中堅，可以作改造社會的先鋒。一千四百所的中學，二十三萬五千的中學生，一致起來，作惟理是從，「當仁不讓」的，打倒升官發財的思想的事業，比之二十三萬五千人的軍隊之彼此相殺要轟烈得多。他們振臂一呼，真可以震動寰宇的。

這是說中學生的本性的可能。卽就其地位說，他在社會上不是「貧無立錐」的貧民子弟，也不是富人貴族的子姪，他們多是小資產階級的子弟。他們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可以上天堂，可以下地獄，可以高攀統治階級做其奴隸，可以下入貧民之窟，充當領袖，可以助桀爲虐，作搾取者的爪牙，以魚肉自食其力的大衆，也可主持正義，助被壓迫者打抱不平。總之，他可以與富有者同享榮華，也可

以與缺乏者同受辛苦。正如天路歷程有寬窄兩條道路，躬在他的面前。他是三叉路口的行者，可左可右。如果指導他們的人，是聽過中山先生的講演的當知道指導他們走那一條路。

孫先生說：「第一是要本黨現在的黨員人格高尚，行爲正大，不可居心發財，想做大官要立心犧牲想做大事。」（見黨員不可存心做官一講。）孫先生又在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中說：「依我看來，在這個時期之內，第一件是要立志，立志是讀書人最要緊的一件事。中國人讀書的思想，都照爲士爲四民之首，比農，工，商，買幾種人都要高一些。二三十年以前的學生，他們有一種立志，就是在閉戶自讀的時候，總想入學中舉點翰林，以後還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諸君的不是那種舊思想的立志。中國幾千年以來，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們那種立志的舊思想，專注重發達個人，爲個人謀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同。近代的人類立志的思想，是注重發達人羣，爲大家謀幸福。……所以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甚麼叫做大事呢？大概的說，無論那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就是大事，（如拍斯多之研究微生物）……」

「……環顧學校之內，四圍有花草樹木的風景，洋房馬路的建築，這一種繁華文明的氣象，比較學校以外……真是有天壤之別呀！我們中國人現在的痛苦，每日生活至少總有三萬萬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所以中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諸君享這樣的安樂幸福，想到國民同胞的痛苦……應該立志，想一種甚麼方法，來救貧救弱這種志願是人人應該要立的。要大家担负救貧救弱的責任。去超渡同胞。……」

站在三叉路口的學生本可以隨意走那一條，可是我們照道理講來，是應當走中山先生所指點的路的。應當担负救貧救弱的責任，去超渡同胞的。如只想走升官發財一條路，恐怕人多路窄，有墮巖跌澗的危險。即使僥倖不跌落，而能够登峰造極。可是被壓搾者心力耗盡，取無所取，亦同歸於盡耳。

有的人或許會駁我說：你的話中山先生早已先你而言

了，何以升官發財的思想至今尙沒打破。不錯這一句駁得很有力，可是孫先生在遺囑中尙說，革命尙未成功。革命尙未成者，不是指政權尙未到手，是指人心尙未改造成功而言。用武力奪取政權，是表面上的成功，用教育變化人心，才是真正的成功。也即是孫先生所說的霸道與王道。辛亥革命，若無宣傳，則成功決不能如此的容易。因為宣傳也是教育作用之一種。可惜當時的宣傳，到後來竟成不兌現的抄票。人心雖有一時的激動，終沒有徹底的改造。我們知道舊思想既深入人心，決非短少時間所能奏效，中山先生雖已先我而言之，可是後來無人在這一方面下切實工夫。所謂切實工夫，便是專心幹教育事業以打破升官發財的舊思想為目標，不斷地幹下去。一年不成，兩年，兩年不成，三年，八年，十年，廿年之後，必有所成。正如植木非一朝一夕之事，至少也要十年的光陰。

有的人或許要說：「現在的學生之想升官發財，是因為無職業可就的原故，如果施以職業教育，使他有業可作，他便會不去想其他了。在我看來，又是錯誤的話。今日學生之想升官發財，並不是因為無業可做，其有此種思想

之由來，自有其深遠之歷史，和社會的背景，心理的原因，前面已說過不少了。恕不再贅。即使有業可就，其心中未嘗不想升官發財，一旦有升官發財的機會，他必定舍職業而去。何況中國現有之職業，不必在學校學習，即可以幹；如須要專門學習的職業，因帝國主義者的侵畧及我國經濟的崩潰又不能發展；且不說在學生中照本宣讀的職業教育無用，即謀真能應用，亦無用武之地。中國今日之問題，不在為學生預備從事職業的技能；而在開發實業。實業何以不能開發，在帝國主義之侵畧，和統治階級的摺取要去此兩大障礙，當先打倒升官發財的思想，更先要打破中學生的此種思想，然後他們不再走舊路，不去「助桀為虐」；一方可以助被壓迫者主持公道，一方可以減少壓迫者的壓力。然後民困可蘇，民困暫蘇，事業方可以興；事業興，才有業可就，才可以禦外資的侵入。否則今日職業教育，明日職業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決不甘於就職業；即欲就也不可得；至多不過在外人的工廠公司中當工頭或買辦來侵畧壓榨我國人而已。由此可見中等職業教育之無補於事。最要的還是在打破升官發財的思想。

由上面所說的看來，中學生是可有可上可下的，依目前社會的狀況看來，所謂職教這條路是走不通的，牠所應走的路在消極方面是不可做大官，積極方面是應當做大事，應當做幫助民衆的事。

有的人或以為中學生不能負起這個責任，以為他的學識不足，年齡太幼。他們不知道，中學生在社會的地位固不甚低，可是並不甚高，除有力升大學者之外，多係一般清貧的子弟，他所做的事體，如經商，教書，經理自己的產業，辦理地方上的公益等，都是與一般民衆接近的多，他的地位既在一般民衆之中，而又畧在一般民衆之上，所從事的又多係教育方面的功作，如果他有心為民衆，其效率一定很大。至於說他學識不夠，這也很難說定；因為學識不一定得之於書本。即以目前的狀況論，有許多大學生尙不及中學生。何況學識之事，由實際經驗得來者多，大學生多係富有人家的子弟，有的粟麥尙且不辨，那知民間的痛苦。中學生除有少數升學者外，多係清貧子弟，他體會得人間的甘苦，聽過了貧苦人們的呻吟，他知道他們的痛苦之所在。他們知道他們所希望的是什麼。他雖然年青，

可是他有反抗社會的勇氣。只要他在學校所受的教育是尊重他的人格的是啓發他的理智的（讓他自己有觀察有思考有判斷的。）我們萬不可以年青而忽畧了他，如果他有人格，有理智，又有氣象，他定可以「一以當百」的。有的或就心他太青年，出到社會上會給人看不起。因為中國一向是尙齒的，他却不知近來的空氣已有轉變，老者因其太頑固，已為社會所譏笑不再信之如神明了。社會所希望的是真能為他們謀幸福的人。並不問年歲的長幼，如果中學畢業生，確能在社會上幫助大眾，做有益的事，大家一定很信任他的，這乃是一種打破宗法社會尙齒的重要武器。

有的人或許要說青年血氣未定，恐怕遇事操之過急，會引起其他變動。其實這也用不着耽心。如果在校的時候訓練得法，凡事均腳踏實地做去，出校後自能謹慎將事，近日的學生好高務遠不願實際者，因為他在校的時候，只讀死書，未能真正了解社會實況與親身從事過實際的工作也。

或又以為青年出校後無事可做，雖有能力也無用武之地。講到這一點，其可以致此之原因有許多種，而根本的

原因倒不是無事可做，乃是中學生升官發財的觀念在作祟。中學校址多在城市，青年為城市的習慣所沾染，多羨慕城市中官吏的生活，及城市的繁華，遂不甘鄉居，而學校中向不注重學生將來之工作，即有之亦多勸其上進。至於民間方面正需人指導，需人幫助，辦學者毫未顧及，而學生也以事太平凡而不措意。殊不知到民間去乃真正的做大事呢！我們知道鄉間的小學要人，民衆教育要人，公務處理要人，合作事業要人，農事指導要人，婦女生育要人，……據教育部之調查，每千七百人中有一個中學生，中學生何患無事做。由此可見並不是無事給中學生做。乃是中學生不願做。不過自來中學畢業生無事可做的原因，尙有一點，即是一向的中學教育不訓練學生真正為民衆做事，所以一到民間去，便與民衆衝突，以至他們見青年而却步。我們現在要使青年與一般民衆合作。要訓練他，虛心而有禮，能幹而寡言，使他有成績給民衆看。一旦得了大眾的信任，不特他們不拒絕他，恐怕還要大大地歡迎他呢。

這是不升學之言，其升學的在中學既打破做官發財的思想，而有救大多數貧苦同胞的決心；其在大學中所研

究的方面自當不同。將來畢業之後，或繼續研究，或外出服務，其努力的方面自當與終日夢想做官發財的不同。因為中學時代實人生的再生時代，也即是轉變的時代。轉變之良否，當視其受教育如何而定。如果中學教育能打破其謬誤之觀念，而培養正當的人生趨向，實大有功於社會人羣。

有的人或嫌這種辦法太遲緩，不能救當前之急，以為等到所培養的青年出而應世，恐怕早給帝國主義者所顛覆了。現在請分別言之。

一、求急效之不對。求急效是表面的事，決不能解決根深蒂固的問題。辛亥革命本不能稱成功，但孫先生已致力了二十餘年，可是因為教育功用未到，終有帝制復辟及軍閥專政等的事情發現。而民間的根本思想始終沒有改變。十五六年的北伐，因軍閥政治的作惡，人民深望有以顛覆之，所以革命軍興不到兩年，而全國統一。可是革命尚未成功，因為「人心尚未改變」。換一句話說，便是教育的功效未到；教育的功效未到，而只貪表面的成功，無論如何不大靠得住。我們試看，如果日本的變法，不努力教

育，蘇俄和土耳其的革命，不努力教育，德意志的改制不努力教育，他們都會不成功的。我們如果要革命有真正的成功，在革命之前後以及進行之中，都非努力教育不可。專制帝王用教育愚民；民主國家常用教育覺民。受了數千年專制壓迫的人民，教育工夫不能收效，若求速達，視教育為遲緩而無用之物，乃是根本的大錯。單貪表面的成功，而不問實際，讓舊思想死灰復燃，只有延長革命的時期。所以自辛亥以來，革命尚未成功者實因忽畧教育之故也。

二、其次請談帝國主義的侵畧。現在帝國主義的侵畧方法，決不用滅人國家；絕人種族，也不用多年前之所謂瓜分。他們唯一的目的。在榨取，只要你給他榨取，他總是歡迎。而且他們的榨取決不用「殺雞的方法」，希望一次取盡牠的金卵，他反而養畜牠，使牠每日給他一個金卵。所以現在我們用不着怕瓜分，怕滅亡，所怕的是大眾不努力。要是日本不努力自拔，土耳其不努力自救，他們也不免同我們一般。在歐戰以前，誰不知道土耳其不行，可是他能努力自救，以一戰敗國家，反而自己振拔。我國乃

一戰勝國家，反而至今不振！印度不特被帝國主義侵略，其被帝國主義者統治；然而時至今日，他也要振拔起來。所以我說，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可怕，自己不努力不振拔才可怕！大家莫以為教育的功效太遲緩，殊不知非用教育的方法使「人心大大地改造，」什麼革命都不會成功的。

三、結束——以上順筆所之，無乃太形拉雜，倘有許多要說的話沒說，而篇幅已不少了，且無組織更覺歉然。現在且讓我結束一下，或可稍清眉目。

- 一、中國社會的現狀是窮和亂。
- 二、窮和亂的來源是「世界已變人心未變」。
- 三、未變之人心中最顯著者，為升官發財的思想。
- 四、目前最要之事在打破此種思想。
- 五、教育是打破此種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
- 六、中學教育更為比較重要工具之中重要者。
- 七、教育的功效雖緩然而非他不能澈底澄清。
- 八、除教育外，當然倘有其他的工具可用。
- 九、打破舊思想，須不可忘記打倒帝國主義。
- 十、從前只顧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忘記教育的工夫，乃

是大錯。

二、所謂打破舊思想，乃是當今教育上主要目標之一，並不是置其他於不顧。

三、至於負這種使命的中學教育，當如何改進，請待他日，當另文論之。

明德旬刊 是國內

中等教育界的代表刊物

注意教育者不可不看——看了可知國內著名中學的實情

明德校友尤不可不看——看了可知母校近來的進步狀況

圖書館學校明德校友及公共團體索閱者概不取資編輯

兼發行者——長沙西園明德學校旬刊社

教育與民衆第三卷第三期目錄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

|                            |         |
|----------------------------|---------|
| 現代中國教育的兩宗疑案.....           | 雷賓南     |
| 民衆教育之經濟觀.....              | 陳禮江     |
| 怎樣評量民衆教育實驗事業的成績.....       | 許公鑑     |
| 今後教育民衆的途徑.....             | 徐旭      |
| 識字教育的改良談.....              | 盛文浩     |
| 民衆詞典編排問題.....              | 杜定友     |
| 編印民衆報之探討.....              | 林宗禮     |
| 漢族姓氏的研究.....               | 陳光珪     |
| 羣育公社之教育的考察.....            | 陳大白     |
| 比利時之工人教育.....              | 張景珉     |
| 工人教育重要著述之撮要.....           | 鄭一華     |
| 本院實驗民衆學校二十年度第一學期之實驗方案..... | 許公鑑     |
| 農業推廣實施方案.....              | 儲勁      |
| 社橋村民築路之經過.....             | 姜和      |
| 怎樣對付我們的敵人日本.....           | 顧德柏     |
| 最近民衆教育消息.....              | 陳大白 鄭一華 |
| (出版處) 無錫江蘇省立教育學院           |         |
| (定價) 全年十期定價大洋一元五角零售每冊一角    |         |
| 六分                         |         |

人文月刊第二卷九期要目

|                          |      |
|--------------------------|------|
| 四十七年前累戰勝法之馮子材提督像.....    | 沈恩孚  |
| 對日外交痛史.....              | 潘光旦  |
| 章實齋之家譜學論(續).....         | 惜陰   |
| 紀甲申中法戰事馮王關前諒山之捷.....     | 王士企  |
| 吾國中央銀行與金融界之改革.....       | 江東阿斗 |
| 古紅梅閣筆記.....              | 關漁   |
| 讀書提要.....                |      |
| 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              |      |
| 大事類表(九月)                 |      |
| 新出圖書彙表                   |      |
| 最近雜誌要目索引(共一千六百七十九目)      |      |
| 另售每冊三角郵費二分半              |      |
| 預一全年十冊國內三元國              |      |
| 定一外四元八角郵費在內              |      |
| 總發行所                     |      |
| 上海辣斐德路亞爾培路西首南錢家塘一號       |      |
| 人文編輯所                    |      |
| 代理處 上海 生活週刊社 文明 新月 啓新 南新 |      |
| 泰東 現代 大東 北新 神州國光社等書局     |      |
| 代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      |

## 民衆生計教育

馮 鏡博士講  
李錫周筆記

主席，各位教授，各位同學，各位來賓，兄弟今天得到這個機會到這裡和各位敘談，藉資切磋，實在是榮幸得很。惟是主席剛才對兄弟的介紹，諸多贊許，畢竟對心有愧，因為兄弟自從由美歸來，至今已有一六七年了。在這六七年當中自問的確是沒有什麼大振作。不過就本人素抱的主張，向着我國急需的農民生產，及平民教育方面，做點實際工夫。故此就同一班同志，在河北定縣辦個小小的試驗。這個試驗凡到處參觀過的人都說有很好的成績。這種話實在是過獎了。其實我們在定縣那個試驗，現在還沒有得到全部成功。有一部份工作，也許有多少貢獻於社會。但我們仍不敢引此為滿足。這次主席要叫我來演講。我一時想不出什麼漂亮的題目來，只好說說我國最急需的民衆生計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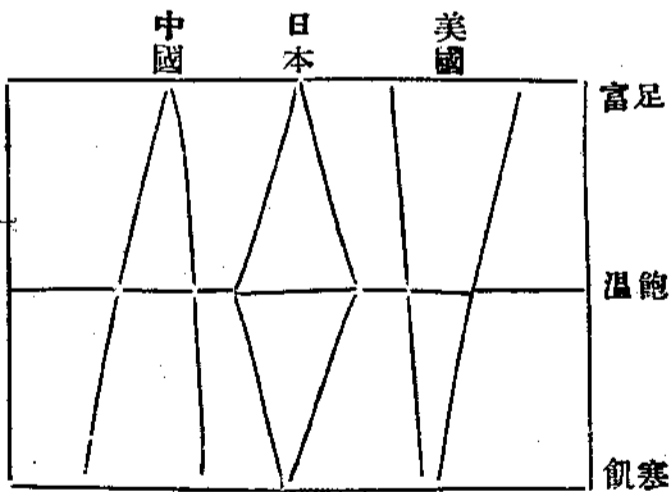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用盡他們的野蠻手段，侵略我國的東三省，現在把東三省已經整個吞併去了。我們同胞

在這種國難的當頭，實屬救國之不暇，本來沒有什麼心神去討論別的事情。正不過現在中國欲以武力和暴日對抗，事實上有點未能；對日經濟絕交，當為目前絕好的辦法。所以民衆生計教育，在這個時候，人人都應該努力去提倡。還有這次東三省的行政長官，無抵抗的把東三省奉送到暴日的手上，這樣的行政長官，固然罪當萬殺，但是全國的政治，沒有良善的組織，以及人民沒有監督政府的能力，也是不能逃其罪咎。然為什麼弄成這種怪象呢？我說大約不出中國現在的四病：

(一)愚——據教育統計我國有七千萬未受教育的學齡兒童。還約有三萬萬二千萬不識字的群衆。這種情形無怪人民沒有能力去監督政府了。不獨這樣，且令貧民的人數增多，破壞了全國的實業。人民愚蠢，無論所作何事，為農，為工，為商，都是簡陋不能和別國競爭的，做政治工作的人，也因為未能與人民的知識上下一貫，對各種事實

，又未有專家研究清楚，故此每遇問題發生，就極感困難，這樣怎麼能令政治組織得到完善呢！這種象徵，總是今日愚蠢的結果。

(二)窮——我國號稱農業的國家，農產物應該可以自給自足了，但是現在的情形，工商業固不能和各國競爭，就是農產物也非靠外國運入不可。今以糧食而論，據民十八年實業部的統計，是年外米輸入者有九二五三六〇三担，外麥有五六六三八八担，單是這兩項共數，已逾一萬萬五千萬元的漏卮了。其餘如棉貨烟草等更不在少數。那末其他的工業品自然不問可了。年中因為衣食住行各種物品的需要，多仰給外人的鼻息，以致國家經濟狀況漸呈衰落象態。更以國人外受外債的牽累，條約的約束，難求經濟有所發展；內受天災兵匪的蹂躪，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剝削，又怎樣叫人民不窮呢！人民窮了，又怎可令牠們有機會去求學問，又有什麼方法去監督政治的組織呢！那末更令政治每况愈下，形成下面這個景象了。



(三)私——所謂「外人知有國而不知有家，華人知有家而不知有國。」這兩句話我們雖然未敢贊同，但無論如何多少，總有幾分是這樣的。袁世凱要做皇帝，他就不顧國家利益，暗自承認日本那二十一條要求，想藉此完成自己的地位，現在東三省那一班媚外求榮的國賊，亦沒有一個不是爲了自私自利，而作出這種寡廉鮮恥的賣國事情來。他如鄉中的居民，也是這樣自私，勇於私鬥，怯於公戰的。并且爲了少納一點稅，就將田畝的數目瞞報，如此種



種都是國人自私的弱點，這樣情形，怎麼能令全國一致去爲國努力呢！

(四)窮——國人對於衛生一事太不講求了。其中原因很多，如地方自治未能實行，警察又對衛生全不注意，并且他們自己已經太不講求了，因爲這樣原故，至到隨時隨地都發生着瘟疫，及其他的傳染病，病疫發生了，一方面是增加人民的死亡，他方面則令人民多得疾病，所以人民得到不死的，至少是身體孱弱了。其餘如空氣，日光充足；住居，飲食的不潔淨，也是致弱的原因。這樣的情形，就是影响到人種的衰弱。人種衰弱了，人民就沒有進取心，及奮鬥的精神，並且沒有貫徹研究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那末怎能令國家不弱呢！

剛才我上面所提那四種病，在我的眼光看來，最重要的就是窮，因爲窮就沒有機會去求知識，是以恐了；因爲窮就沒有辦法去講求衛生，是以弱了；又因爲窮沒有學問，沒有道德，爲着飯碗的問題，那有不私的道理呢！故此解決貧窮的問題，當爲目前最急需的工作，然則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就有下列三項：

1. 應用科學方法增加農業生產——增加農業生產的方法不只一端，英國加拿大南美等均取墾荒的方法，令他們的耕地增多，德美丹麥日本等國均取改良牲畜，種子，土壤，栽培等方法。使他們的產量增多，這種科學方法，都是很有效的。我國現在應當做效外國，兩法並用，因爲現在廣東的耕地，和可耕而未耕的共有四千餘萬畝。如能把他擴充，令到野無棄土，產物自然大增。他如土壤，肥料，灌溉等的改良，使地力增加；畜種，種子，農具，栽培等的改良，使產量增多。那末農業的生產不獨可以自給自足，并且輸出那些剩餘產物來增厚國庫了。

2. 改善經濟組織，豐裕人民生活——經濟改善有用急進手段的，如蘇俄的集中生產，及大規模的國有經營便是了。有用緩進手段的，如丹麥的實行合作社制度，從多數人民利益的本身設法便是了。我國現在的情形，不能適用急進的方式，若欲謀大資本的企業，也是不適宜，所以最好還是效丹麥一樣，努力合作事業的提倡，組織農民銀行，以及各種合作社。如信用合作，販賣合作，生產合作，消費合作等。務使從合作主義，創造中國的新經濟制度。

這樣做去就能令到人民的生活及地方的經濟有充裕的發達了。

3. 改善地方原有工藝增加人民生產——我國內地的小工藝很多，如榨油，製糖，繅絲等等，年中得到利益不少，但因無組織，資本缺乏，指導乏人，不能抵抗外國工業之侵畧。故此一日一日衰落下去，實在是可惜極了。自今以後，我們應當切實研究改善地方工藝的方法，注重地方自行組織，務使他們在生產時，得以增加成分，減少產值，這樣做去，一則可以使其發達捷速，二則可以免除大資本家的發生。人民的經濟機會，藉此又可以得到平均。外人的經濟侵略，從此也可望其斂跡。國民經濟自然可以進到平穩的境地了。

我上面所說那三種救窮的方法，若果要他得到相當的實現，則非靠各種人才，切實去做不可，各種人才從那裡造出來的呢？想誰都承認是必要從教育方面造出來。故此這種教育是教人民出來生產的。實際地教現在農工商民衆。這可說就是民衆生計教育了。我們知道這種教育是須適應人民的需求，以及地方的需要，務使從事實上着手，不

能憑空就擬造計劃。所以對於教育時的教材，應當格外注意。我中國現在的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病，固然是不能普及，但教材的不加選擇，更是病中的病。譬如某教授從某一國回來當教席，他就拿某一國的教科書來教授學生。不問他適合中國的情形與否，以及他所教的是否是學生們所應得的學問。因此就弄成中國的教育制度，亂七八糟，成了歐美日俄等國的教育試驗場。怎麼能令教育有切實的貢獻呢！現在，貴學系各教授個個都明白中國教育的病態，很積極的去找尋民衆需要的事實，編成教材，將來想裨益於國家前途甚大，我們做生產事業的人，也同樣去教育人民，使他在生計的道上工作。農林局現有的政策，都是跟着生計教育的原則做去，將來需要借助各位的地方很多，望大家共同努力并是了。

馮梯霞先生近回粵主農林局，暫以番禺為試行上述計劃的區域，逐漸推行于各縣。本校教育研究會上週請馮先生來校演講，因錄其講稿以供諸同志研究。

編者識

# 中國民族的出路與中國教育的出路

莊澤宣

去年三月我得到中華教育界來的信，說是要出一本「中國教育出路專號」，要我在一個月內寫一篇文章。那時我正預備同了一班學生到江浙與北方去參觀，沒有空執筆，雖則我對於這個問題也想了一下，可惜並沒有成一個系統。從廣州到上海的時候，我就告訴中華書局的人我這篇文章恐怕是寫不成了。到了北平遇見了舒新城先生，他還是要我寫，我就提議大家先談一談。於是我們在同到定縣參觀的來回途中，暢談了幾天。回到北平又約在熊佛西先生的家裡，談了一天的天，在座的還有邱大年王西徵兩先生，後來羅隆基先生也做了不速之客。我那天才把我的「高等教育革命論」提出來。回到上海中華教育界的人對我說專號的付印紙等我的文章弄得我很難為情。那時旅行了一個月感想很多，思想很雜，而且沒有一個時候能安定的坐下來寫，直到歸航中方草了一篇短短的「中國今後教育出路的我見」，送登專號，真是對不起中華教育界。

好了！這專號居然在上一週出版了。裡面除我的外着

實有些好文章。我看了以後生了更多的感想。兩三年前，我對於中國教育的出路問題雖則也亂寫了幾篇文章，曾在「教育研究」及「教育雜誌」等處發表，但是因為應和的人少，我的主張不敢太澈底，胆子不敢太大。自後「教育雜誌」的社評欄內雖也常對中國教育下深切的批評，但也還少具體的建議。而這一個專號不但把中國現行學制抨擊得體無完膚，並且有不少具體而澈底的改造方案，這是多末快人的事！

大體的來看，這些文章的作者，都以為（一）現行學制是生吞活剝從西洋搬過來的，必須改造，（二）這樣的學制在經濟困難的中國是行不通的，（三）因此要取消大中小各級學校，（四）縮短小學年限，（五）提高小學入學年齡，（六）小學畢業後注重實際訓練（七）提倡自修與考試制度，（八）廣設圖書館及社會教育機關，等等。這些主張我兩三年前也都講過，當時沒有人聽，現在居然一致的提議，這當然是使我非常高興，而令我更大胆的作進一步的申說。

從我這兩三年來的觀察與所感到的來說，我以為這些主張還不發徹底。我覺得這些制度改來改去還是牛頭不對馬嘴，因為這些文章的作者，所有的頭腦子（連我的在內），都是太西洋化了！所用的名詞變來變去，還是那一套，都逃不出西洋的把戲，孫行者的本事雖大，跳不出如來的手掌。因此所推的論理，所得的結論，完全是西洋式的。

譬如我的老友何日平先生，曾經在社會中奮鬥過幾年，對於中國的社會可說是看得很清楚，他那篇文章裡的事實也是千真萬確，然而他的論調定全是西洋式的，即使照他的辦法找到他所謂「出路」，結果恐怕還是「此路不通」何況他的辦法先就無從實行，還有他把世界上一切的亂源都歸到人口太多這未免把這個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人口非在某種限度以下，不能創造文化，這也未免太武斷，他對於日本近年文化的猛進就無法可以自解。西洋人雖不能過日本人的刻苦生活，難道中國人不能過日本人的刻苦生活嗎？

所以我以為我們要找中國民族的出路與中國教育的出路，第一件事先要打破用西洋式的辦法去解決中國的問題那樣的辦法，這還是受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遺毒。

我雖不敢說西洋人現在以增加消費來增加生產的那種辦法去促進文化是一條死路因此我們不應在後面盲目的跟住走死路，但是我敢斷言中國民族與中國教育若是有出路的話，他的出路決與西洋現在所走的路不同。從此點看來，第二件事我們所要注意的，中國向來對於任何制度的推行，是不用「法」的力量而用「人」的力量，這至少在最近的將來還是如此的。

根據這兩點，這專號中許多的提議就不攻自破了。

然則今後的出路如何？我自問我的頭腦子也是太西洋式了，未必有好的答案。據我現在所見得到的學校雖未必關門，也無「法」使之關門，學校式的教育終必為少數人所享的權利，決不會普及，即使普及也祇處於輔助的地位而不是在主要的地位。後者的地位必讓之于非學校式的教育，而這種非學校式的教育，恐也非西洋式的社會教育，連現在所謂「民衆教育館」也似乎太西洋化了，未必是中國社會所需要的。

教育是必須適應社會需要的。今日的所謂「新教育」在初辦的時候的確有一種需要，那就是當時社會中需要買辦

階級和通譯人才。我們看四十年來生意興隆的上海某教會大學（即最近幾年幾乎關門）便可知了。但是這個需要是有限的，現在無限制的如法泡製，以致不但「人才」過剩，而且弄到「文化」破產。

現在社會的需要是什麼？當然很多，但是最切迫的莫過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其次的便是經濟狀況的復甦，先使整個民族能透過一口氣來。在這一方面需要積極的普遍的教育的地方很少。消極而言之，一切的教育設施有背于這種需要的都應在打倒之列，無怪乎舒新城先生有「學校關門論」的主張在已設的未能關門以前，應限制其設立並增高其收費，雖未免有「寫禁于征」之謂。

如何使人民生活安定經濟復甦因賴于政治領袖人物的覺悟，先消極的不作惡，或少作惡，然積極的必賴整個知識階級的共同努力，因此我有所謂「高等教育革命論」。

高等教育整個革命的辦法，我在去年九月間草就，早知道中華教育界的出路專號出版如此之遲，我當時就寄去登載了，我以為該專號已付印，乃把這文寄至「生活」不料東北事變突起，生活忙于登載「國難」文章，無暇發表。後

來「教育雜誌」來徵稿，才寄去，不知何日出版？

這篇文章的積極方案之一，便是要大學教授與高級學生以中國鄉村整理為對象，從各方面來作實地的研究，但必須拋棄西洋式的觀點與成見，先把中國的社會是個什麼東西看明白了，再來研究改進的方案。中國已經到了很危急的時候，我們趕快要設法挽救，這是不錯的，但是數十年來我們救國之心太熱切了，以致一錯再錯，弄到焦頭爛額更其危險，所以我以為心是要熱的，而頭腦是要冷靜的，必須看清事實腳踏實地的去做，且莫亂喊口號。

七八年前我在清華提議設立「中國文化」研究院，原意是想把中國過去現在的文化來客觀地研究一下。我主張清華派赴美國留學的學生——尤其是研究社會科學文學哲學的——在修了各種基本學科以後，叫他們回到中國來，仍舊給他們官費，讓他們在清華或他校或到處去研究調查考察（大約一年的留美費用那時在國內至少可作兩年用）。在必要時可在國內研究二三年後再到歐美留學一二年。如此的養成了一班中國適用的「專家」，再把清華改辦為一所中國適用的大學。

這個計劃一變再變，研究院開辦了，但是是研究「國學」的，在國學方面的貢獻雖也不少，然而並不是最初提議的我所想的那種研究院。另外也通過了一個留美學生「中途回國」的辦法，但回國時停止官費而且毫無監督與指導，任各人自己找事做，也沒有收到研究中國文化的效果。大學也開辦了，但是完全是西洋式的，連我最後提議分期設系求精不求多的計劃也整個打消，于是在北平公私林立的大學中又增加了一個！

我所理想的研究院與現在山東的鄉村建設研究院的研究部大致相同，但是規模要大得多。當然規模大了，自有許多弊病，這不但在當時即在今日恐也時機還太早。不過以清華的地位而言，或許可以發生若干影響，至少可以稍稍轉移風氣。

清華的好處是在（一）經費充足而可靠，但這還不算唯一優點，有時甚或可成爲一個弱點；（二）校內學生全是從各省選送來的優秀青年，而且許多是從小入校絕沒有沾染外間風氣（這也可說是優點也可說是弱點，因爲如此更與外間社會隔離——也因爲如此在年歲較長時必須給與到社

會中實習的機會）。這第二優點，當時我很主張予以相對的保留，一則由於清華的款本由各省攤派，原定各省名額是照攤款數分配，這不但是公平而且各省青年都有入學的機會；二則當時沿海各省中學教育雖較發達青年求學機會雖較多，內地大多數省分仍不如此；所以我以爲沿海各省的名額或可直收中學畢業生去補充、內地各省的名額不妨在中學（清華所謂中等科及高等科的前半）中保留，否則名額大部分必爲沿海各省的青年奪去，而尤關緊要的是學風必大變，清華至多成爲較好的普通大學而已。然而終於通統失敗了。

做這種整理內地的的工作，必須是「本地人」去負擔，這是我與山東現行辦法同一主張的，所謂「本地人」當然不以籍貫爲標準，凡在該地住居頗久熟悉一切的都可稱之。因此山東的辦法在現在祇能及于魯東，在將來至多可推及于全省，而且有隨政潮而興廢的危險（韓復榘在河南辦村治學院，韓去而院閉，乃再在山東辦此院）。若清華能把這件事負起來，所收學生又遍于全國，則影響必更大，況且以官費在國內留學之十元津貼的辦法更易吸引爲經濟所困

不能研究的人。清華的計劃既未能實現，祇好希望各省都照山東的辦法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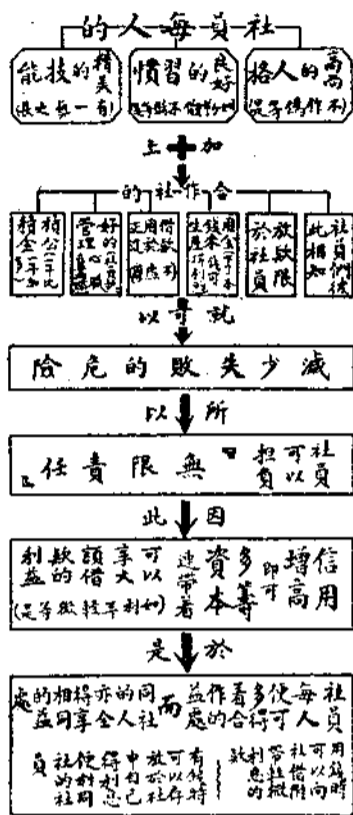
但是我還感到單是整理內地還不是唯一的出路。這樣不過把人民生活弄到安定一點，經濟弄到復甦一點，而一方面內地已有人滿之患，一方面又無「法」可以限制生育，必至于捉襟見肘，結果不過爾爾（不過這結果確是一切建設的基礎，照今日現況長此下去，並此而無，則中國焉得不亡。）況且這樣做法，中國文化恐又變為靜止的、而難有新生命。因此我還要進一步主張同時提倡和準備移民。

一個文化要有新生命，我以為或由于舊文化中來了一種新民族能接受舊文化而予以新生命，如日耳曼人初入西洋文化舞台那樣，把希臘羅馬的文化從新救回來，但是這回手續的經過犧牲是很大的。或由于舊文化跟了移民到新境界中，因應付新的境界而得新生命，如歐洲的文化到了新大陸發生了新的文化那樣。今日科學的發明尤其在應用的物質科學方面以美國的為最多，就是因為到了新的境界發生新的需要的緣故。中國內地的整理，至少在最近的將來，我很懷疑，需到許多的應用物質科學。即今日所謂

農業改良如種子農具等等，凡足以省人力的，就全體人民來看是否有益，還是一個大問題。質的改進或是需要的，量的增加，若到了生產過剩或勞力過剩便會發生危險。但在移民方面則不然。無論向海外或國內邊疆移殖，我們都需要物質科學的應用——尤其是開發邊疆。

東三省是已經在開發過程中，我們固必須爭回，青海及天山南路，據調查過的人說皆地曠人稀且有開發的可能，外人勢力也還未達到，我們必須趕緊去開發，但也必須政府資本家與學術專家通力合作，這也是我的「高等教育革命論」中方案之一。在清華改組的時候，我也想提議在這方面作相當的準備，就原有的農藝系基礎去發展，就經費與地位來看，清華在那時至少可以對東北及內蒙古作極大的貢獻，可惜也沒有人願聽，到後來並此農藝系也裁去了。這種開發的初步自以農牧為主，但礦產及羊毛工業也必有極大的收入。照我看來這不但足以為國民經濟開一富源，過剩人口得一生路，且因此而實際的應用物質科學，使中國的文化得一新生命，較之內地的整理，功效當更遠大！

內地整理與移民殖邊的初期或不需要很多的普遍的下級教育，但在內地整理的過程中，合作事業必須提倡，而合作方法的傳授即為最好的普及教育工作。我們看華洋義賑會在河北提倡合作社功用的圖解便可知之：



這不是最好的教育嗎？但是這種教育的有形施行期，據該會的經驗祇要一週或十日，因要受這種教育，事先必須識字，事後再供以巡迴文庫，不必官廳強制，一經提倡，自然舉辦「關於該會種種將在拙著民衆教育一書中詳述」。

內地整理稍有眉目，經濟力既增，「衣食足而後知禮義」，那時再提倡今日所謂學校教育不遲。但即至那時已經整理的各省或在今日比較經濟力較高人民生活較安定的

省分尤其是特別市如廣州上海等地，入學年齡必須提高，免費的全日上課的下級教育至多兩年，兩年後希望升學仍想受全日上課的教育必須繳費。（除極少數確係貧苦而又極有天才的可免費升學或逕予津貼）其他大多數的則一面學一面做，半時上課再四年然後聽其自由繼續與否。

移民殖邊在最初試驗時期不需要大批移民，則應選已畧受基礎教育的人予以津貼，使跟着專家去試行開發，在當地當然有許多問題需專門學識，重要的由專家為之解決，一般的則此等人亦可一面學一面做，但大可不取學校形式。試行開發有效需要大批移民時，在出發以前到達以後，或亦須施行短期訓練。真正的學校教育則也在他們能自立以後，而其形式恐也將取上述的辦法。

這些計劃要大規模的去做，當然要靠政府的力量。政府諸公若能看清這是中國民族的出路，則應盡力扶助，但亦不可操之過急，萬不可再蹈施行「地方自治」的覆轍，沐猴而冠。若衰衰諸公不暇及此，則唯有人民自動的去幹，做一點算一點，但望外來勢力不如意料之快，則中國民族終可在極大的犧牲中打出一條血路！



至于局面安定經濟較裕的省分 and 特別市所辦的各級學校，除在制度上縮短年限提高入學年齡外，還須注意于內容方面。譬如上海及江浙一帶工商業較發達的地方，中等職業及高等專門學校皆有開辦的可能，因必須十分實際而專精，方可收效。尤其緊要的是生活上的訓練，這不單指人格上的態度，而處世的習慣亦包括在內。現在一般的大學與中學生，生產技能則一無所長而消費的能力却日增不已。十年前的大學及高中學生絕少穿西裝者，今則初中學生已有之，大學生幾無人不穿。若有人統計學生用費，我敢斷言十年來至少加兩倍。最妙的近來各地學生有向學校要求減輕學費的運動，其結果即使減少繳納于學校的費用而向家庭索取如故，甚至家庭的負擔反而增多。家庭不能負擔者則設法在外兼做事教書或其他工作。學生時代即養成奢侈習慣，畢業後雖欲吃苦而不能，真可浩嘆！

這種奢侈習慣，不但使個人增加耗費，且增加外貨的銷路，因所耗費的大都是舶來品，此豈愛國青年所應為？送錢給外國人已不能怨，况非自己去賺來的，况因此而使中國日窮！或以為中國沒有錢自己不能生利的人固應節省

，即有收入的人也應量入為出。今日奢侈之風不獨使個人入不敷出虧空負債，將使整個社會破產。至于公款的使用，大家更漫不經心隨意糟撻，所以中國一方面是最窮之國，但一方面也是最浪費之國。欲救此風，則一方面在提倡節儉教育，一方面在喚醒全國人士防止浪費。在此地我不得不佩服馮煥章先生的精神，希望黨政領袖諸公注意這不是個人面子問題而是國家存亡問題。在中國內地未經整理邊疆未能開發國富未能積極增加以前，無論公私方面誰多浪費一文便損失國家富力一些，積少成多，便是使中國經濟破產的罪人，便是與中國民族出路背道而馳，終陷于絕境而後已，可不懼哉？負教育的責任的人們，應以身作則，不獨金錢方面應一個錢當三個錢用，工作時間方面當力求經濟，才可以挽狂瀾于將傾。

自西洋文化衝破我們的閉關政策以來，因為正當西洋帝國主義全盛的時期，侵畧之來異常兇猛，一切的精神制度都有壓倒我們的之勢，我們初則無從應付，終而至于屈服。國民黨在孫總理領導之下創議打倒帝國主義，頗喚起一部分民衆的覺醒，祇可惜空口講白話，有打倒之口號無

打倒之事實。在文化方面，尤其在教育方面，我以為最足以亡民族的生命，莫過于失去自信心自信力。所以我希望今後國民黨執政者對於民族自信力應及早恢復。在此地我們應當感謝馬占山將軍和東北義勇軍。有了這種精神，我們不怕不能收回失地。同時負教育責任的同志應以恢復民族自信心為最大職責。我們若做內地整理工作，應當注意中國民族固有的美德懿行，這就是我四年前寫「如何使新教育中國化」的時候，提出四個條件，而以「發揚中國民族的優點」為其中之一緣故。中國民族性當然有不好的地方，我們自當時時提醒，但若研究此種性格之所以然，便知道他們並非不可恕而確有其理由，況任何民族皆有其弱點，斷不能因此而抹殺我們民族的優點。以六千年的文化廣播及于大過歐洲全部的面積，必有顛覆不破的地方。我們在整理內地的時候，必須十分注意到這些地方，如此方可以恢復民族的自信力。

在沒有整理內地以前，我們也應當隨時隨地就我們所見得到的，向民衆及受教的學生宣揚文化固有優點，這不是一班遺老遺少所提倡的「保存國粹」，而是積極的恢復

民族自信心自信力。（即如提倡國貨在今日已人人認為應該做的，但仍多着限于「利權外溢」，殊不知還不僅僅在于挽回國民經濟力量，且也是保存固有文化上的遺產的必要手續如絲綢磁器等均為中國文化上結晶品，故提倡國貨實具有保存文化的重大意義，負教育責任的人應多着限于此。）我們相信任何民族失去了自信心自信力，雖有固有的立足點，也會滅亡的，——可說是這便是自己亡自己之道。有了自信心自信力則雖有弱點亦可以改正，況且在不少眼光遠大的外人看來，中國文化有許多為西洋文化所不及的優點，在將來世界文化中要佔到極重要的位置的（如羅素便是此種主張者之一）。

話說多了，而且因起草時時作時輟，不免凌亂無序，現在把我對於中國民族和中國教育出路的幾點意見，歸納如左：

- 一、中國教育必須中國民族有出路方有出路。
- 二、中國民族的出路在積極方面目前有兩條大道：
  1. 整理內地以安定人民的生活發現文化的優點，
  2. 開發邊疆以樹立舊文化的新生命。

三、中國民族出路在消極方面目前也須顧到兩點：

- 1. 力求時間精力尤其是用款的經濟以撐支危局，
- 2. 鼓舞民族自信心自信力以作起死回生的心理基礎。

四、為整理內地起見，我們最需要的是鄉村建設領袖人才的訓練，一般的人則應受廣義的民衆教育。

五、為開發邊疆起見，政府資本家必須與專家合作，應用科學知能從實驗到推廣的去工作。推廣時必須施移民以特殊訓練。

六、為力求經濟起見，政府及社會領袖人物必須提倡刻苦生活及防止一切的浪費。一切教育均須在節儉上做功夫。

七、為樹立民族自信心自信力起見，我們應隨時隨地宣揚中國民族固有美德，傳播歷史上偉大成就與人物及提倡國貨等事。

八、如此我相信我們必能在困苦艱難中打出一條血路。

民衆教育通訊第一卷第十期要目

民衆教育運動之史的認識.....李邦權

民衆教育館革命論.....徐朗秋

民衆文字教育概論.....茅仲英

民衆戲劇概論.....閻哲吾

報 嘉定縣徐行區民衆教育館黃草織品展覽會報告.....徐植壁

告 南滙縣立民衆教育實驗區創始時期之概況.....鳳天飛

從事社會教育行政所得經驗之拾零.....邵震樓

計 本館推廣部二十年度進行計劃及實施方針.....本館推廣部

劃 案.....本館推廣部

本期消息索引.....編者

本刊第一卷分類總目錄.....編者

編輯後記.....編者

定價：每冊大洋一角二分全年十冊定價大洋一元（郵費在內）

發行：鎮江范公橋省立鎮江民衆教育館民衆教育通訊社

# 村 治

第 二 卷 第 七 期 出 版 了

## 目 錄

|                     |             |
|---------------------|-------------|
| 鳴呼！中國之前途！……………      | 李樸生         |
| 日本農村經濟考察錄（續完）……………  | 張佳玖         |
| 丹麥的農業與農民（續完）……………   | 張我先譯        |
| 各省農村經濟與農民運動（續）…………… | 李育文譯        |
| 江西的農村經濟與農民運動        | 湖北農民運動與廣西派統 |
| 治下的湖北農民生活           |             |
| 各地鄉村運動消息            |             |
| 全國鄉村改進機關聯合會喜訊       | 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第  |
| 一次農展會紀實             | 黃墟開辦碾米廠     |
| 轉 載                 |             |
| 中國農村新經濟的建立……………     | 孔雪雄         |
| 通 訊                 |             |
| 江西農村合作運動發端……………     | 劉兆昌         |

每 冊 零 售 一 角

全 年 廿 四 大 洋 一 元 八 角 訂 閱  
半 年 十 二 大 洋 壹 元 內 在 郵 費

歡 迎 直 接 定 閱

北 平 西 單 牌 樓 舊 刑 部 街 四 十 號 村 治 月 刊 社  
電 話 一 四 七 〇 號 發 行 處

各 省 市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 本所已出版之叢書

|             |      |      |
|-------------|------|------|
| 兒童自由畫研究     | 趙我青編 | 定價四角 |
| 中學作文教學研究    | 阮真著  | 定價六角 |
| 學看外國文之研究    | 周勝泉譯 | 定價三角 |
| 如何使新教育中國化   | 莊澤宣著 | 四角五分 |
| 中學國文校外閱讀研究  | 阮真著  | 定價五角 |
| 中學國文各學程教學研究 | 阮真著  | 定價五角 |
| 小學分級字彙研究    | 王文新編 | 一元二角 |
| 一個教育書目      | 莊澤宣編 | 三角五分 |
| 鄉村教育新論      | 古棣編著 | 一元二角 |
| 中學作文題目研究    | 阮真著  | 七角五分 |
| 教育學小詞典      | 莊澤宣編 | 定價七角 |
| 基本字彙        | 莊澤宣編 | 五角五分 |
| 法德英美教育與建國   | 崔戴陽編 | 一元二角 |
| 兒童閱讀興趣的研究   | 徐錫齡編 | 定價五角 |

以上各書均由各埠民智書局發行 倘有四種在印刷中  
本刊合訂本除第一集經已售罄無存外第二至第七  
集每集定價大洋五角第八集大洋六角

### 編輯處

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育學系

### 訂購處

廣州中山大學教育學系

### 代售處

上海暨南大學南新書社  
南京特別市教育局研究部  
廣州民智書局  
廈門集美學校教育推廣部  
南京中央大學出版組  
上海上海中學  
廣州嶺南大學書局  
杭州民衆教育實驗學校  
無錫省立教育學院研究部  
鎮江省立中學師範科

### 印刷處

廣州市前鑑街文雅印刷所

| 目    | 價  |      |      |      |
|------|----|------|------|------|
|      | 本校 | 門市   | 郵寄   | 外埠   |
| 每月一期 | 一毫 | 一毫四仙 | 一角三分 | 一角半  |
| 半年四期 | 四毫 | 五毫   | 五角   | 五角半  |
| 全年八期 | 八毫 | 一元   | 一元   | 一元一角 |

(國內以國幣計算國外以美金計算)

# The Chinese Journal

OF

##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IX. No. 1.

FEBRUARY 1932.

Whole No. 33.

### C O N T E N T S .

- Tiyu Gaknen of Mejiro, Tokyo.....Pu Huang.
- The Philosophy Underlying the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in Italy  
.....Tr.by T.M. Chen.
- Shall We Continue to Emphasize Knowledge in Education ? ...I. Hu.
- The Miss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n China.....K. Tang
- Education for Economic Improvement of the Mass.....J. Feng.
- Whither China and Whither Chinese Education ? .....C. H. Chuang.

Published eight times a year, monthly  
Except June, July, August, and January  
by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ton, China,